



这是我2016年12月在光谷广场综合体建设现场拍摄的照片。武汉光谷广场综合体工程，经过五年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光谷鲁巷区域的交通状况和环境面貌，并显著促进了光谷的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名老武汉市民，我深知这片土地的发展变化对城市居民的重要性。从2016年到2019年，我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通过相机拍摄了百余幅光谷广场综合体建设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仅是对工程进展的简单记录，更是通过视觉语言的表现形式，用深切情怀，将这块地标建筑从无到有、平地崛起的建设过程永久留存下来。“风帆”变“星河”，我为能借助相机镜头见证并记录这一惠民工程的建设历程感到由衷欣慰。希望通过这些照片，人们得以了解光谷广场综合体的建设印记，更为武汉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而自豪。

（摄影 / 撰文 陈志勤）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张智勇 陈胜利
陈红英 林伟 徐莉 潘红莲
燕来宾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1984：晴川饭店挺立武汉新高度 / 尹新秋

风雨同舟

<<< <

11 人生的马拉松 / 余丹

九城同心

<<< <

16 蒲纺记忆：永远的二三四八（下） / 胡沙岸

委员天地

<<< <

23 工笔描绘时代，水墨渲染和谐

/ 李乃蔚（口述） 章旷怡（整理）

28 传德传医，做有担当的中医非遗传承人

/ 吴启梅（口述） 靖涵（整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

32 汉派服装的抉择与坚守

/ 陈 飞 (口述) 闻 夕 (整理)

人物春秋

<<< <

36 父亲涂允成的任教与治水生涯 / 涂光瑜

都市史话

<<< <

45 中法建交“第一团”轰动巴黎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一 / 何忠杰

50 “咬文嚼字”黄鹤楼 / 张胜仪

史海钩沉

<<< <

55 库里申科和他的大队长战友们

——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追踪之三 / 谌达军

62 《金口镇志》引录《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指谬 / 胡晋鄂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84，晴川饭店挺立武汉新高度

◇ 尹新秋

轮印：1984年7月10日，晴川饭店挺立大江之畔，开始试营业。它高达24层共88.6米，超过1909年建成的汉口水塔（41.32米）、1924年建成的江汉关钟楼（83.8米），刷出武汉新高度，代表武汉新形象。

1984年夏天，阳光浓烈的时节，晴川饭店开门迎宾，那可是轰动江城的一大新闻，武汉各大媒体做了特别的策划和打破常规的报道。《长江日报》头版，整个版面除了标题，就是一张晴川饭店傲然挺立的照片——一个全城兴奋的表情。

对外窗口

晴川饭店于1979年4月破土动工，1984年7月竣工，总投资2783万元，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全国同期筹建的旅游饭店，还有广州白天鹅饭店、南京金陵饭店、成都岷山饭店。同时，各省市设置旅游局，配套开办旅游学校。对外开放，先做旅游文章，晴川饭店成为国家开放布局的一个点。

此前，武汉的涉外饭店是璇宫饭店、江汉饭店、胜利饭店。三家老字号饭店各有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鄂革文(1978)31号

关于晴川饭店工程建设的通知

武汉市革委会、湖北化肥厂建设指挥部、省工办、财办、计委、外办、建委、物资、成套、商业局、分行：

根据中央批转外交部发展旅游计划的安排，国家计委国计(1978)177号文通知，确定在武汉建造旅游大楼(即晴川饭店)。为了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晴川饭店工程指挥部，全面负责工程建设工作。指挥部由省建委领导，外办协助。指挥长由樊步先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由王登玉、全宗仁同志担任。工作人员由省建委、省外办和物资部门抽调。

二、工程的勘察、设计任务由湖北工业设计院、湖北综合勘察院、湖北给水排水设计院、武汉电讯局、二航局设计研究院等单位承担，湖北工业设计院抓总。要求工程初勘资料于四月底提出，建筑设计方案于四月底报省审查。

-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函复对湖北
晴川饭店扩初设计

(79)侨旅字第005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关于对湖北晴川饭店扩初设计，国家建委已以(79)建发设字76号文批准同意。现将国家建委的批复文件附上，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湖北晴川饭店扩初设计审查意见的批复；
关于对湖北晴川饭店扩初设计审查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一月

抄送：湖北省建委、湖北省建设银行、湖北工业设计院、
湖北省中国旅行社

- 5 -

4个英文班，1个日文班，毕业后70多人进入晴川饭店，其他分配到另外3家外事饭店和扬子江游轮。王建华做过前台、领班、前台经理、销售经理，一直到总经理，伴随酒店的发展一路成长。

今年4月24日下午，王建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1984年到1994年，是晴川饭店最辉煌的10年。

第一任总理由省旅游局

行管处处长兼任，饭店资源多而竞争对手少，发展挺顺利。80年代末，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外国专家，有几年常住晴川饭店，18、19两层楼全包了。90年代初，东风雪铁龙公司的法国专家也住了两层楼，三年后才搬到沌口开发区三角湖别墅。

特色，但房间太少。接待能力最强的江汉饭店，新楼旧楼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个房间，设施老旧，“门脸”也小。1982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了胜利饭店门口，迟迟不肯下车，以为不是他要入住的酒店。

晴川饭店300多间客房，595个床位，以气派的塔式主楼、宽敞的迎宾大厅、富丽堂皇的大小宴会厅和设施一流的客房，成为江城首屈一指的涉外饭店，更是湖北省对外开放的形象窗口和招商引资平台。它富有楚风汉韵的壁画，在当时也是独具风骚。

一份资料显示，1984年7月10日到1985年12月30日试营业一年多时间中，接待了“中日友好大联欢”“三五汽车拉力赛”等大型外事活动，接待了西德总理科尔及美国亚拉巴马州、俄亥俄州代表团，西德巴符州代表团等重要贵宾和团体，总共接待宾客72567人次。客房的使用率1984年下半年为45.3%，1985年上升到63.9%。

晴川饭店现称晴川假日酒店，总经理王建华是湖北省旅游学校1979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那一届200多名学生，5个班，





晴川饭店接待过不少外国首脑和各界名流。王建华最难忘的是1985年接待西德总理科尔。19楼有两个总统套房，一个角一个，分别住着科尔和夫人。那次安保规格最高，整个19楼都由德方负责。王建华那时是前台副经理，英语好，饭店就他一个人有特殊胸牌，可以上19楼。他说：“有次跟科尔撞了个满怀，是他撞了我，他那大个块头对我笑了笑，说对不起。”

此前的1970年代，西德援建武钢一米七工程，约300名工程师大部分来自杜伊斯堡。一天，一位德国工程师陪刚来武汉的夫人到长江边散步。夫人看到汉水汇入长江，很像杜伊斯堡莱茵河与支流鲁尔河两江交汇，回去后她立即给杜伊斯堡市长写了一封信，呼吁家乡与武汉结为友好城市。1982年，两城牵手，成为首对中德友好城市。那时，晴川饭店还在修建。落成后，杜伊斯堡市长和代表团到武汉，都爱入住晴川饭店。

王建华知道我在大桥局工作过，自然谈到大桥。说武汉长江大桥总设计师、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1991年和1992年两次入住晴川饭店，都是他接待的。老人家身患重病，走路不方便。一进房间就到窗边，

久久望着长江大桥，兴奋又激动。第二次入住时，王建华看到老人家对着长江大桥不停地流泪。

我写过一篇有关大桥局的文章，熟悉西林这个名字。是他首创一种打桩方法，解决了长江大桥深水作业的难题，大桥施工得以突破性进展，工期提前了两年。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了给他的感谢状。西林对大桥的感情，感动了王建华；他对西林的深情回忆，



美国唐道格先生和太太，每年结婚纪念日来晴川假日酒店住一晚

又感染到了我。让人住得舒适的酒店不少，能让人触景生情的并不多。

美国的唐道格先生和太太，是我们一期节目的主人公。夫妻俩 2003 年来到武汉，唐先生做了一家国际学校的校长，唐太太做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每周到晴川一家儿童康复中心做一天义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他们都会到晴川假日酒店住一晚。喜欢那里的美式自助餐，也喜欢那里的风景。有长江，有大桥，江和桥是带有世界性的“共情”意象。

临江“绝版”

晴川饭店更名为晴川假日酒店已经 25 年，但上点年纪的人，还是习惯叫它“晴川饭店”。更名前的 15 年，它一度是武汉酒店业的翘楚。人们分享了开放初期它带来的自豪与荣光。

晴川饭店在人们不经意间突然拔地而起，当时武汉 10 层以上的高楼都不多见。1996 年，泰合广场以 176 米的高度超越晴川饭店之前的 12 年间，它一直是武汉第一高楼。人们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饭店，更把它看成一个地标、一张城市名片。

现在，武汉超过 100 米的高楼达 5200 多栋，有的高度是晴川饭店的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七倍。但后来居上的高楼，几乎都是市场经济的单一向度，很难像晴川饭店那样引起广泛关注和持久注视。

曾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晴川饭店，对背景、立项、选址做了这样追忆：“1978 年 2 月 9 日，省委常委会听取外事部门关于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确定分配湖北新建一座 500 床位的外事旅游饭店的汇报，当即决定抓紧建造。事后，旅游部门提出在汉阳晴川阁北侧修建晴川饭店。3 月 23 日，我和省市有关部门负



负责同志到晴川阁实地察看。那里依龟山，傍长江，邻接长江大桥，毗连着历史上有名气的晴川阁，既是城区中心，又是宁静地段，临江可辟建停泊旅游船的专用码头，交通畅达，环境优美，大家都认为是建旅游饭店比较理想的地方。”（见《湖北文史》第85辑）。

晴川饭店位于晴川阁北麓，东临长江，南距长江大桥约500米，西靠晴川大道，北距汉水入长江口约700米。

晴川饭店建成后，周边的景观陆续多起来。隔江相望的黄鹤楼1985年竣工，近处的龟山电视塔、晴川阁、铁门关、晴川桥、汉阳江滩……相继重修或建成，彼此呼应，蔚为大观。

晴川饭店，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

它看着城市一天天长高，但鳞次栉比的高楼隔着山隔着水，两江交汇的南岸嘴现在还是一片树林，汉阳江滨3公里内没有新建高楼，40年来它一直保持着开阔的视野。

它看着城市一天天变美，特别是灯光点亮长江之后，白天一些不怎么显眼的景观，如鹦鹉洲大桥、长江二桥以及一艘艘游船也一齐耀眼起来，又都是它的“借景”。

人们习惯把长江大桥、黄鹤楼、晴川饭店看成一个“组合地标”、一个城市核心圈的“金三角”，它连着龟山蛇山、长江汉水，地理格局，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都一起“标注”出来了。

今年4月9日，晴川假日酒店负责市场媒体的经理马晓晴，把我领到20楼。三镇风光，齐来眼底，“极目楚天舒”。江堤像一根带子，感觉长江就在脚下。

马晓晴经理说，当时选址真好。现在的业主想把酒店推倒重做，最后放弃了，因为再做就不能这样贴着大堤做。根据新的《防洪法》，要让出大堤50米。汉口几家

后来建的高档临江酒店，都不得不隔了一条马路。

晴川饭店这样零距离亲近长江的酒店，武汉仅此一家，今后更不会再有。它是临江高档酒店的“绝版”。

樱花传说

1982年起，我在莲花湖旁住了10年。每次经过长江大桥，对晴川饭店都会多看几眼。夏夜，常去大桥下乘凉。长江大桥和晴川饭店之间，时有阵阵江风。但总觉得，晴川饭店的灯光有些炫耀，市民有钱也住不进去。那时一个熟人在晴川饭店工作，曾邀约我去玩一玩，但不好意思专门去“挂眼科”。

1992年，我从大桥局调到武汉电视台。策划选题，首先想到的是拍扬子江游轮。三峡大坝修建之前，许多游客抢着去游三峡，题材不错，也是想借此到晴川饭店里面去看一看。

晴川饭店江畔，就是扬子江游船码头。游船和晴川饭店一样，只收外币，不收人民币，乘客都是晴川饭店的房客。我们摄制组坐上扬子江号游轮，跟拍到秭归，再乘下行游轮回到武汉。那是我第一次“涉外”，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晴川饭店。

不久，晴川饭店的接待范围渐渐放宽，社会名人、富商巨贾、明星大腕都可入住。记得是1994年，汉正街首富、武汉华侨友谊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举选（绰号“盲侠”），为庆祝他在马场角的新房落成，在晴川饭店设宴答谢宾朋，我也躬逢其盛。上次只是到了大堂，这次落座在20楼宴会厅；上次只是听游船上的客人说环境不错，这次有了切身体验。正好座位临窗，窗外风光直扑觥筹之间。

兴建晴川饭店，先由国家财政拨款。1981年，国家将尚未完成的基建项目拨款改为贷款。同时，在城市体制改革中，逐步开始将旅游饭店从招待式的事业单位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转型。晴川饭店从试营业起就是企业单位，并背上了基建贷款债务1989万元。员工有500多人（现160多人），包袱重。

从外部来看，武汉的高档酒店也渐渐多了起来。到1990年代中期，晴川饭店出现亏损。1996年开始合资，由新加坡一个集团控股，占股份65%。1999年12月31日，更名为晴川假日酒店，委托洲际酒店集团管理。外墙的乳白色换成了“樱花粉”和“假日绿”，那是品牌酒店的“标配”。内部也改变了装饰风格，王昭君雕像、楚风汉韵壁画等地域特色，悉数换成了商务宾馆的“流行色”。

晴川饭店的主要设计师袁培煌先生几年前一到晴川假日酒店，就要看王昭君的雕像，当他知道王昭君雕像已经搬走，气得捶胸顿足。湖北美术院为饭店创作壁画的几位

艺术家，也曾向有关部门“要说法”。

酒店换了主人，换了招牌，也降低了门槛，它已是普通市民休闲、聚会的选择之一。

2021年3月，樱花烂漫时节，我到晴川看樱花。晴川是武汉第三大赏樱地。“晴川吹雪”和“东湖樱舞”“珞樱缤纷”是人们熟悉的“花语”。晴川假日酒店四周，都有樱花点染，最引人瞩目的是酒店后花园。不一定住酒店，也不一定消费，上午9点半以前可以入园观赏。

我曾穿过酒店大堂，到后花园流连。花荫小径边摆了许多桌椅，酒店推出了自助餐、下午茶。武汉赏樱的地方不少，据统计有161处，而能把餐桌摆到樱花树下的，独此一家。除了“繁花盛宴”，这里还有一点与众不同：樱花枝条间，挂了不少白色布偶。问酒店的工作人员，才知那叫“晴天娃娃”，日本人用它来祈愿天晴人好，正暗合了“晴川”之意。这里的日本元素，不是单纯的移植，晴川樱花有一个情义相牵的故事。

王建华告诉我，日本老人英子，他见过三次，中文说得好。老人的先生是黄陂人，



2021年3月，外国记者在樱花树下留影、品尝樱花主题下午茶

有相当家产，生前总跟她提起故乡，嘱咐她为故乡做点事。1983年，老人来到武汉，住在胜利饭店，送给胜利饭店一套洗衣设备（当时国内还没洗衣设备，靠手洗）。送给扬子江游轮一台川崎重工生产的发动机。1984年春，老人来到晴川饭店施工现场，也送了一套洗衣设备，但比胜利饭店的那套更大、更先进。此外，老人给晴川饭店送了全套的墙纸（当时国内尚不时兴墙纸）……还送来100多棵樱花树苗。树苗只有拇指大小，老人嘱咐：樱花怕水，要种到坡上，不要种到坡下。

由此，晴川饭店悉心栽种、浇灌、灭虫、修枝，精心养护，樱花成了晴川一景。晴川的樱花是名贵品种“染井吉野”，在日本也不多见。“染井吉野”树形高大，开花成簇，先是白色，渐变粉色，比一般樱花好看。

我去晴川没几天，看到老同事发朋友圈：武汉举办“世界‘樱’你而来”活动。外国友人分三路到东湖、武汉大学和晴川赏樱。韩国《中央日报》，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西班牙境菲社等多家媒体的记者，从晴川阁到晴川假日酒店，一路兴致勃勃，看江景，赏樱花，品尝樱花主题下午茶，有的还换上汉服在樱花树下留影。

英子老人有眼光，她给樱花选了一个好地方。每一次绽放，都会吸引世界的目光。

璇宫饭店，江汉饭店，胜利饭店，晴川饭店，当时的四家外事饭店，现在仅剩晴川饭店一家。另外三家比它建得早，面对市场有太多的历史局限。比它建得晚的酒店，可以抬高起点，提升档次，但任何一家高档酒店，都不可能像它那样，因得天时，占尽地利。

晴川假日酒店1999年大修，2013年又大修，现在又到了维修季。它一面维修，回



应岁月的风雨；一面优化内部装饰提升服务，应对市场的风云。然而，这一幢楼不会变，这个地标不会变，它将与长江大桥和黄鹤楼一起，带着时代的印记，守着江天，迎送日月。

尹新秋，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原海外专题部主任

人生的马拉松

◇ 余 丹

人物名片：余丹，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户外登山运动协会副会长，湖北省田协路跑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户外运动登山协会会长，武汉光合经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我去参加首尔马拉松，接我回酒店的路上，韩籍华裔朋友笑着对我说：首尔马拉松是亚洲最古老的马拉松，有70多年历史了，很多人都是一家三代人跑马。所以在首尔你看不到肚子大的男人，因为这在首尔人看来，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我放眼路上的男士，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大腹便便的。而回想到国内，无论是地铁站还是商场内，挺着大肚子的男人真的是随处可见。我当时就在想，能否推广马拉松运动，带动更

多的人跑起来，让大家的肚子小下来，人健康起来。于是，我在自己文化公司的文化板块之外，就加了一个体育赛事板块，特别是结合我热爱的马拉松运动，开始在国内致力去推广这项运动。

我的第一场马拉松

我从小在体院长大。小学一年级我在学校的水泥台上打乒乓球，被教练看中，训练了2年；又被湖北省体校的教练看中，让我直接住进省体校大院。从此半天文化课，半天训练，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但是乒乓球这个赛道太难了，作为国球炙手可热，比我更有天赋更加勤奋的孩子数不胜数。山底太拥挤，大家都想山顶见，我是属于那种没爬上山顶的人，就退役了。

因为是运动员出身，一旦停下运动，身体立刻像吃了催肥剂一样发福了。2013年我近40岁，人到中年，头发也秃了、肚子也大了，爬三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一副标准的“中年油腻男”形象。心想着这样下去不行了，要改变一下。自己也是心很大的，同年9月，我在完全没有马拉松训练和经验的情况下，依靠着年少时打下的底子，就直接报名了北京马拉松。

当时的马拉松不仅鲜有人关注，而且每逢赛事还需要体育局去各地动员大家参赛。根本就不存在今天还要抽签，或者花3000元购买慈善名额才能参赛。当我以5小时47分钟完赛后，到了终点楞住：工作人员告知，奖牌发完了！然后要我们登记邮寄地址，一个月后再给我们邮寄过来。这就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以至于跑完了都没有可以晒朋友圈的奖牌。

跑完了第一场马拉松，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挑战100公里、12小时。最疯狂的是2015—2016年，平均每年都要跑25、26场马拉松。最多的时候35天跑了7场马拉松，星期六跑一场全马，星期天接着再来一场全马，至今已经跑了98场马拉松。

承办比赛带动更多人跑起来

武汉的第一届马拉松，我是运动员代表，还担任第一届、第二届武汉马拉松的官方配速员；并在广州、长沙马拉松等著名IP赛事中，共担任7次官方配速员。不仅自己跑，也带动别人跑，许多亲朋好友受到我的鼓舞，加入到跑步的行列中。我还担任



获2023年武汉统一战线“同心奋斗者”称号

了湖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武昌区路跑协会会长等行业职务，去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跑步运动中来。

我的体育公司发展很快。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热爱，带动很多人来跑步；另一方面，那个时候跑步的人数不多，赛事不多，我们就办一些民间赛事、特色赛事，很快就成长为一家网红公司，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这个时候，正好赶上马拉松运动的高速发展，有一家业内非常知名、在香港上市的体育集团公司，他们所承办的赛事忙不过来，就把我的公司整体收购了，还约定我们整个团队去他们的集团，协助他们做好马拉松赛事。

这段打工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成长得非常快。一方面，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国内顶尖的赛事运营团队、承办的都是国内顶级的标准赛事；另一方面，这段时间也是国内马拉松的拓荒期、规范期，大量的赛事标准、赛事规范将马拉松赛事由原来的无标准、无规范迅速发展成为体系健全、标准明确的行业。一场马拉松，少则一两万人，多

则三万多人，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感受赛事温度、安全完赛并获得好成绩，都是那个时期我们苦思冥想的事情。正是在整个行业“内卷”之下，使得马拉松赛事的整体运营能力大幅提升。

与收购方的合约结束后，我继续自己的赛事经营，借助收购方平台，结识了行业内的很多大佬，有机会参与促进行业发展的项目。目前我经营的武汉光合经纬文化有限公司是中国田协在湖北的五家会员单位之一，拥有自己的IP赛事，每年承办大大小小的数十次赛事，影响着更多的国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氛围中来。

小时候有个阴影，就是“山底太拥挤，大家都想山顶见，我是属于那种没爬上山顶的人”！于是，在现在的赛事上，我就办了比马拉松更“山顶”的赛事——超级马拉松。我的超级马拉松的口号就是：“山底太拥挤，我们山顶见。跑步的人太多，我们超级马拉松见！”我自己也跑过香港超级马拉松、福州超级马拉松、厦门六天六夜超级马拉松等国内知名赛事，一边跑赛事，一边办赛事，一边交朋友，一边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赛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湖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场

在奔跑中凝心聚力

2010年，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社员主要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多是在实验室和讲坛上的专家学者。有一年我专门为党派在金银湖举办了一场健康跑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参与的社员特别踊跃，随后我们又在东湖绿道举办了一次健康跑。

这让我感受到运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是非常需要的，随着运动使人快乐、运动让人健康的理念逐渐普及，低门槛、高回报的跑步，成为普通人的首选。跑步没有年龄、财力、体力歧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一名文体行业的民主党派人士，我从当年的统战工作中也得到一些启发，武汉的跑友有数十万人，如何将他们凝聚起来呢？

一是找准代表人物，发挥“用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在跑圈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朋友，跑圈是一个可以忽略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地方。只要你跑得好，就是

“大神”，就有粉丝。跑步成为了一种融合剂，吸引着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共同参与，围绕跑步、配速、训练这些话题，其乐融融、美美与共。

跑圈的代表人物有三类人：一是跑团的团长，他们经营着整个跑团，费心尽力，在自己的跑团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二是高水平的选手，跑团虽然有很多“佛系跑者”，但跑步有着最基本的评判指标，就是谁跑得快。谁跑得

快,谁的粉丝就多,高水平运动员自带流量。三是身材好颜值高的跑者,他们往往开通了自媒体,每次跑步都录下自己的身影,发到自媒体上,从而获得粉丝。我们做跑友工作的,只要抓住这三类人,基本上就可以联系上所有的跑者。无论是招募跑者参赛,还是宣传赛事中的文明礼仪,还是科学训练安全完赛,都可以通过他们进行传播和影响。

二是多办活动,提升凝聚力。在活动中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展示力量。跑圈的活动一般也是三种:首先是训练营,通过训练营提升大家的奔跑成绩,贯彻科学训练安全奔跑的基本原则。其次是组织例跑活动,跑友们参与最多的,体现跑团组织活力的就是例跑活动,一般跑团少则一周一次,多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方面在合适的绿道和专业的场地上举办活动,如武汉的东湖绿道、武汉江滩、沙湖绿道等;其次,也会去寻找一些有特色的路线,如“岳飞在武汉寻迹跑”“红色文化打卡跑”“网红美食跑”等路线,既可以让跑友锻炼身体,更让跑者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最后是组织跑友参赛,每当有大型赛事来临,就要组织跑友集中往返、餐饮住宿、跑前合影、赛后合影等,在全国的赛道上展示武汉跑者的风采。

三是宣传城市,传播正能量。马拉松是城市的名片,是形象宣传片,是流动的风景,是最热烈的城市景观。借助马拉松赛事,一座城市的人文历史、风景名胜、时尚风范甚至投资环境被跑马的队伍、看跑马的观众口口相传,是更大的财富。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一场服务周到、体验优良的马拉松比赛,对提高城市美誉度,甚至改善投资环境,效果比硬广告投入更好。

推动马拉松产业释放消费潜能

2023年,湖北省有13个市州举办马拉松赛事,共计27场,有超30万人参赛,综合经济效益超过60亿元。

身为九三学社湖北省委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我对经济发展比较关注。结合自身的马拉松经验和对这一领域的思考,针对湖北省马拉松赛事吸引力不足、选手消费场景少、社会化参与不足等问题,我在2024年湖北省“两会”提交《关于发展湖北省马拉松产业 促进有潜能的消费的建议》提案,提了三条建议:

一是打造精品赛事。首先是以国际田联的相关指标为目标,鼓励赛事主办方及运



2024年参加武汉马拉松

营方邀请精英选手参赛，提升湖北省马拉松赛事在国际田联的排名。其次是激活文旅体融合发展，依托省体育局和文旅厅、商务厅成立湖北省马拉松赛事专家智库，围绕当地产业、特产、民俗、文化、历史打造赛事文化，吸引选手参与，避免省内赛事同质化竞争，构建一赛一品的省内赛事矩阵。

二是创造消费场景。发放湖北省马拉松消费券，通过文旅局（主管星级酒店）和商务局（主管商务酒店）发放马拉松消费券，涵盖酒店补贴、餐饮补贴、景点门票补贴和特产补贴。既可以率全国之先创造马拉松的消费场景，又能激活当地商户的热情、增大文旅体产业的GDP，还能赢得跑友口碑，传播赛事主办城市名片。除了保证赛事正常运营执行之外，要形成以产业招商为导向、以文旅消费为目的运营思路，而不是为了办赛事而办赛事。研发赛事周边产品和基于报名平台的电商系统，让选手在跑步过程中领略城市风采，在跑步结束之后购买城市礼物带回家。

三是鼓励社会化参与。首先是依托省田径协会搭建湖北省知名品牌，特别是消费类的品牌与赛事之间的互动平台，探索品牌赞助与赛事消费之间的互促模式，让品牌方既能通过赞助赛事扩大知名度，又能通过赛事获得渠道商、消费者，让品牌方因为赞助而受益，因为受益而愿意持续赞助的良性发展模式。其次是引导日常的跑步消费，在湖北省的体育消费券发放中，对报名参加马拉



2023 汉马奖牌与 2024 汉马奖牌

松赛事、健康跑以上项目给予更大额度。最后是大力发展湖北省行业相关的市场主体，出台扶持政策，对湖北省的马拉松赛事、服装装备及相关企业优先给予承办权、运营权。

在马拉松比赛的途中，永远有超不完的选手，永远有人在你前面，你要做到的不止是追过一个又一个对手，更是要超越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马拉松带给人的不只是强健的体魄，它让人们拥有一颗更加强大的心；马拉松带给这座城的不只是一场体育盛宴，更多的是提升城市软实力、促进经济发展。我将立足本职，跑好人生的马拉松，依托平台，助力城市的马拉松。

蒲纺记忆：永远的二三四八（下）

◇ 胡沙岸

辉煌时代的到来

1973年4月，3110工厂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蒲圻纺织总厂，为地（师）级单位。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关系有所改善，1975年3月，蒲圻纺织总厂转交湖北省人民政府。军转民后，挂牌湖北蒲圻纺织总厂，单位行政级别不变。3552厂改称蒲纺总厂纺织厂，3553厂改称蒲纺总厂丝织厂，3554厂改称蒲纺总厂针织厂，3616厂改称蒲纺总厂印染厂。

得益于举国体制下的一路绿灯，军工

建设的严格标准，以及各路人才汇聚，设备设施配备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无数“三线”建设者热血报国、顽强拼搏的精神，蒲圻纺织总厂一经建成投产，迅速成为“会下蛋的金凤凰”。

纺织厂（即3552厂，原一零一工程）在投产的次年1972年，利润就达到91万元，1973年和1974年分别盈利112万元和233万元；其他分厂1975年梯次投产后，整个3110厂利税突破千万元大关。

这在国民经济不太发达的当年，是一个巨量级的数字。湖北省人民政府在接收蒲圻纺织总厂后，深知它的重要性，人、财、物全方位支持蒲纺发展，也实现了军转民产

品结构的成功转型。1978年，蒲圻纺织总厂利税突破2000万元大关，1979年为5313万元，1980年为8140万元，1981年为9588万元。

1981年上缴的利税，已经高于国家对3110厂的原始投入9000万元，日后社会上流传“一年赚回一个蒲纺厂”的说法由此发端。同年，湖北省内生产总值为219.75亿元，财政收入36.87亿元。蒲纺当年总产值3亿多元，利税接近1个亿，在全省大型国企中排名前5位。

当时，从蒲纺入口红旗桥经桂花树、六米桥、二零一、桃花坪、向阳坡，再汇集到红旗桥，形成一个马蹄形闭环、周长10公里的区域。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建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和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城；每个企业都是一座风格迥异的园林式工厂，每个生活小区都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一排排职工楼，每家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大优于当时普遍的平房式宿舍和筒子楼单间宿舍。

东南西北的美食在这里汇集，职工食堂每天的菜谱上有鲁、川、粤、闽、苏、浙、湘、徽中国八大名菜名味。总厂和每个企业都有设施完备的幼儿园和育婴室，配有专职幼师和保育员；全盛时蒲纺普教有四所小学，两所中学，一所高中，职教有一所电大，一所省属职业中专和一所技校。

蒲纺职工医院是国家二甲医院，有床位300余张，每个分厂都设有卫生科。有一



蒲纺民兵训练

句话说的是：蒲纺除了火葬场没有，其他什么都有，连拘留所也有，什么医疗教育、武装公安、消防、通讯、贸易等，应有尽有。

在物质短缺的年代，蒲纺在保供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当时蒲纺有独立运行的商业、医疗、生活系统，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和内部采购渠道。每逢节假日，职工分鱼分肉分水果分紧俏物资，大包成篓往家中拎。如果一家三代都在厂里上班，分的东西根本就吃不完。

1984年8月，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到蒲纺视察。在丝织厂向阳坡一个冷饮店，钱运录看到冷饮店正在营业供应冰激凌、酸梅汤、汽水、啤酒等，也自掏一角二分钱买了一盘冰激凌，尝后称赞道：“好吃！”了解到冷饮店夏令生产雪糕、冰棒70万支，牛奶、咖啡52000斤、冰激凌2000斤，还为全厂职工供应汽水、啤酒、瓜果、绿豆等，连蒲圻县城的居民也争相过来购买，有时还供不应求后，钱书记高兴地说：“冷饮店办得好！”

头顶着军工企业的光环，蒲纺走向鼎盛时期，对资金、人才、技术的虹吸效应也逐步显现。

1984年9月1日，《经济日报》刊登了1984年国家优质产品名单，蒲纺针织一厂生产的“环山牌”涤纶经编鞋帽布榜上有名，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这是蒲纺产品首开国家质量奖的先河，蒲纺从此敲开了创国优的大门。几天后的9月8日，北京又传来喜讯，针织一厂的涤纶经编褶裥布、涤纶经编针织拉绒布，双双荣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1984年11月7日是建厂1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十里纺城张灯结彩，彩旗飘飘；桃花坪体育场数万人聚集，锣鼓喧天，蒲纺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厂庆。象征着15周年的15条金龙，在体育场中央翻滚，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引得观众阵阵喝彩。马力、王炳棠等第一批创业者全数出席庆典，何根法厂长代表总厂党委发表了激情四射的厂庆献词；现场气氛热烈，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很多老军工说，1984年厂庆，象征着蒲纺辉煌时期的到来。确实，从这个时候起，整个蒲纺产销两旺，新产品供不应求，客户排队装货，拿钱等货的现象一再出现。

蒲纺的辉煌带动了企业的多元文化。蒲纺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在这个周长10千米、方圆3平方千米的厂区范围内，有15000余名职工，连同家属共3万多人。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多元的文化在这里汇集、融合，形成蒲纺独特的企业文化。

20世纪80年代初，蒲纺创办《蒲纺报》，建起了电视台和闭路电视网络。1986年，蒲纺首支时装模特表演队在武汉民众乐园惊艳亮相，轰动武汉三镇。在蒲纺中心体育

场，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曾在这里举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蒲纺各分厂都有自己的俱乐部、灯光球场、歌舞厅。

随着蒲纺的兴旺发达，国家重大赛事不断落子蒲纺，名人、艺术家也不断造访蒲纺，留下一段段佳话。

1984年8月29日至31日，著名象棋大师柳大华带领中国象棋国家队来蒲纺献技。柳大华大师以下盲棋的方式，一人对战10位蒲纺象棋“高手”，一时传为佳话。

1986年9月20日至23日，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率领中国轻音乐团专程来蒲纺总厂，一连进行了6场演出。李谷一、刘秉义、闵鸿昌、韦唯等艺术家和歌手新秀，倾情奉献精彩演出。在演出空隙，艺术家们还饶有兴趣地来到丝织厂喷水织机车间，在机台旁观看喷水织机织绸。在力织二车间花机班，李谷一站在织造软缎被面的花机旁，对织造出来的软缎被面赞叹不已：“真是太美了！”夸赞丝织女工“真是了不起！”

1988年5月，全国优秀少年足球队比赛的南部赛事在蒲纺总厂燃起烽火。全国共有18个省市代表队参赛，北京队、天津队、沈阳队、大连队、武汉队等9支球队在总厂桃花坪体育场一较高下。赛后，总厂把“蒲纺杯”奖给成绩最优秀的足球队。

当时，走入纺织城，映入眼帘的是：火车拉响汽笛满载物资呼啸而来，卡车在厂区道路穿梭奔忙，下班的人流汹涌如潮，厂房内机器马达声日夜轰鸣。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入夜灯火璀璨，火树银花，活脱一座不夜城。人们习惯把这里称为“十里纺城”。

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工交司联合评定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蒲纺总厂位列全国第317位。在500强企业中，纺织行业占26家，蒲纺列全国第8位，湖北省第1位。此后多年，蒲纺一直位列500强。

1988年12月14日，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的1988年国家质量奖授奖大会上，蒲纺天龙公司生产的T恤衫面料获得质量最高荣誉——国家金质奖。这是湖北省当年5项国家金质奖产品之一，也是湖北纺织行业首次获得的最高国家质量奖。

此时的蒲纺，产品质量稳定，塔夫绸、真丝绸销售旺盛，席梦思、7支纱市场抢手，在广州、深圳、香港等地久销不衰，一大批产品获国优、部优、省优称号。

楚天织女星，芳华动神州

纺织行业，是织女的世界。在蒲纺，年轻漂亮、美丽大方的纺织女工是靓丽的风景线，也是生产的主力军。她们中，先后涌现出了全国党代会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忠英；省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丁桃明；全国劳模、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苏燕；以及律湘娥、陆承琮、邓秋红、胡琴东、张克勤等一大批模范人物。

在蒲纺状元榜、先进人物中，有一个名字熠熠生辉，犹如天空最亮、最美的星辰！她，就是从7000多人的纺织厂脱颖而出的普通女工张艺霞。

张艺霞是咸宁双溪人，招工进厂时还不满16岁。在师傅鼓励下，她从打结这个基本功练起，每天上班提前40分钟到车间，下班晚走半个小时，勤学苦练。

练得有多苦？练结头，食指被纱线勒破了，她忍着疼继续练，食指练出了一层茧。天道酬勤。1981年10月6日，纺织厂布机

车间举行操作比赛，张艺霞以断经60秒、断纬15.3秒、打结31个，总分100.74分夺得挡车状元桂冠，达到省优级水平。

这是张艺霞第一次崭露头角。从一个从没接触过纺织的生手，到第一次夺得操作状元，距离她进厂当工人，仅仅过去1年10个月。

因为长着好看的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美，张艺霞被工友和领导取了个绰号“小老虎”。她的身上，确实有着小老虎的虎气！

纺织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布机挡车是其中最为辛苦的岗位，近百分贝的噪音，高温低湿的环境，一个班，手脚不停八小时，人跟着布机转，要眼疾手快，光算巡回走的路程，就有20多公里。用什么样的方法操作更科学，既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又减轻女工们的身心疲劳呢？

张艺霞经过反复琢磨，成百上千次实践，总结了“四三四”巡回操作法。通过这种办法，张艺霞一人看管织机36台，一般女工只能看管24台。1988年至1990年，张艺霞采用这种方法，先后3次参加全省操作比武，3次夺得第一名。

1990年10月17日至25日，全国纺织系统首届技术大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隆重举行，60名来自全国纺织行业的尖子选手同台竞技，竞争激烈。最终张艺霞以优异成绩勇夺应会第2名和全能第7名，获得纺织工业部“技术能手”和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两项殊荣。

1991年，张艺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她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4月20至22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纺织部、劳动部等10多个国家部委领导齐聚蒲纺，向全国推广张艺霞“四三四”操作法。

这是纺织行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推广“郝建秀操作法”之后，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示范“张艺霞操作法”，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亲临蒲纺，给了蒲纺职工极大鼓舞。

根据大会安排和嘉宾要求，22日下午，23日下午，张艺霞在纺织厂布机车间，两次演示她独创的“四三四”织布巡回操作法。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纺织代表，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仔细地观察揣摩着她的每一个操作动作。

张艺霞表演断经，取梭投梭双手交叉进行，动作稳、准、轻、快，点梭投梭一步到位，令代表们赞叹不已。张艺霞表演打结，崩头脆而挺，对头准、塞头快、抽头紧，其速度之快，使代表们目不暇接。表演完毕后，青岛棉纺织厂的贺成梅与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的马双英，拜张艺霞为师，决心像张艺霞一样勤奋学技术、刻苦练操作，走岗位成才之路。

1995年8月，湖北省妇联、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宝杯”湖北十大女杰评比揭晓，张艺霞被评为十杰之一，成为湖北省纺织战线女工的楷模。

1995年11月，张艺霞赴京领取了中华技能大奖，该奖系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劳动部、国家经贸委、全国妇联共同颁发，获得此次殊荣的仅有十人。张艺霞是十人之中全国纺织战线唯一的代表，唯一的一名女性，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这是张艺霞人生又一次高光时刻，也是全体蒲纺人的荣耀。

2004年，蒲纺企业改制后，张艺霞转到蒲纺六米桥社区工作，从基层专干做起，先后担任了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主任等职。2019年，她从社区岗位退休，再次就业受聘到新纺纺织公司任人事部主管、党政办主

任。退休以后继续在纺织企业发挥余热，这也是张艺霞蒲纺情结的一种体现。

最后停产时女工哭了

当时，蒲纺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纱、坯布、印染布、针织品、丝织品、服装、袜子7大类、20多个系列、300多个品种。

1988年，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面料就是蒲纺的产品。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彩旗由蒲纺制作。1983—1990年，在全军每年的军品服装评比中，蒲纺军工产品皆名列前茅，成为总后勤部当时的定点服装生产厂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此时深圳特区和沿海地区春潮涌动，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箱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外商最早进入的领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新潮产品，迅速结束了中国物质短缺的时代，给消费者提供了多种选择。

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蒲纺的产品再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此时蒲纺总厂仍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一法人核算体制，其它分厂都不具备法人资格。总厂机构庞杂，人员冗余，如学校、医院、基建、供水、公安、消防、电视台和报社等机构，每年需1500万元运行费用，负担沉重。

为摆脱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蒲纺总厂不断推进改革，探索发展新模式。1997年8月，蒲纺总厂初次改制，总厂更名为“湖北蒲纺集团有限公司”，纺织厂改为“蒲纺三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印染厂改为“蒲纺三元印染有限公司”，热电厂改为“蒲纺三能热电有限公司”等。

遗憾的是，名字改了，但经营管理模式改变不大。此后蒲纺虽几经改革，终未能走出困境。至2003年末，企业资产总额为8.02亿元，负债总额为8.82亿元，“收不抵支、资不抵债、全面停产、全员下岗”。

2004年初，春节过后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把蒲纺下放给赤壁市实行属地管理，并把资产、人事等一并转交，改革改制的大幕徐徐拉开。

从2004年10月20日，法院裁定蒲纺针织厂、丝织厂、纺织二厂三家企业政策性破产开始，到2007年6月30日法院裁定三陆公司、三元公司、三能公司三家企业政策性破产终结为止，蒲纺的破产改制历经了3年多时间。

改制前，蒲纺共有职工15456人，其中离退休3213人。除医院剥离移交430人外，需要安置的职工有11813人。

在短时期内，蒲纺有9137名职工签订了安置协议，置换国企职工身份，买断工龄下岗待业；1388名工龄满30年的职工进入“二缴一发”（缴社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发生活费），实行内部退养；1201名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职工提前退休，前后共安置职工11715名。

2004年8月，蒲纺桃花坪、六米桥、桂花树3个社区正式组建，实现由企业管理到社会管理的转型。2007年3月，经赤壁市委、市政府申报，咸宁市编委办批准，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

立，为赤壁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蒲纺工业园区正式挂牌成立。

2009年2月，原蒲纺最后停产的车间内，上完最后一个工班的职工，关闭设备，然后把与她们日夜相伴的机台擦拭得一尘不染，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忙完这些，勤劳的织女们相视而看，相拥在一起号啕大哭……

改制后的这些年

从集团公司到工业园区，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更是职能的转换：由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变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者和“服务员”。

蒲纺工业园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不仅要服务辖区内的民营企业，更要为已经转为社区居民的3万多原蒲纺职工居民服务。应当说，一个特大的国有破产企业的各种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和民生管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道复杂的高难题！

蒲纺的职工来自全国近30个不同省份，为了祖国的“三线”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三四八纪念馆

他们对这片洒下热血和汗水的土地有太多依恋，对企业发展寄托着太多的梦想。他们当时响应党的号召，拖家带口从大城市来到荒野山沟，“献了青春献子孙”，有的一家三代生活在这里，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改制过程中，总经理张斌与蒲纺原领导班子成员、各分厂中层干部、改制工作队员一起，耐心细致地搞好政策宣传和解释，拼命工作，基本实现了蒲纺的平稳顺利改制。

工业园挂牌后，前后几任园区领导班子，都把改善民生作为园区最重要的工作和方向。

一是交通建设。2013年，蒲纺大道建成通车，从桂花树到709仓库全线贯通，由过去的两车道变成双向四车道，安装了新型路灯，完成了人行道的铺设及两旁绿化带的美化、道路刷黑，同时预埋设排水、供水、燃气等管道。

二是市政建设。2012年，工业园投资3000多万元对整个蒲纺区域启动供水管网改造，铺设供水管道15000米，改造入户管2051户。

三是棚户区改造。蒲纺棚户区改造得到了上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相继完工，棚户区的居民从原来的“鸽子笼”搬进既宽敞又明亮的新居，蒲纺整个生活区旧貌换新颜。

近年来，园区完成了水、电、路、天然气、管网改造，改建了桃花坪体育场、工人文化宫、室外游泳池，小公园和文化长廊；建成代表蒲纺军工文化的二三四八展览馆，通过实物、图片、音像、文字、艺术雕塑等，全面展现二三四八（蒲纺）当年波澜壮阔、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和耀眼业绩，成为赤壁市

标志性建筑，为蒲纺精神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蒲纺从建厂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在军史、党史、在共和国的创业史和纺织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创造的物质财富，曾经为国民经济做出过巨大贡献，它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永远值得铭记。

正如赤壁市刘健先生创作的歌曲《永远的二三四八》所唱的那样：

“二三四八，是你军旗下的代码，走过多少岁月总把你放不下。

就在那座山脚下，你开放成一朵花，引得多少好儿女为你把血汗洒……”

这首歌，唱出了蒲纺人的心声，唱出了蒲纺人心底的情愫。

历史不会忘记，时代不会忘记，永远的二三四八，铭刻在共和国的功勋簿上！

而重温和告别，记录和缅怀，都是为了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创作过程中，参考了雷敬元、马翱、王建、郑卫东、舒欣、舒妍、李佐华、蔡练秋等多位同志相关著述材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胡沙岸，资深媒体人、作家，现为楚天书局副总经理

工笔描绘时代，水墨渲染和谐

◇ 李乃蔚（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李乃蔚，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十二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

2016年，我曾在《武汉文史资料》“往事漫忆”栏目中刊登过一篇名为《我的绘画之路》的文章，记叙了我的成长和成名之路。转眼八年已过，时代在发展，我也有了更多更丰富的创作经历与体会，故再次分享出来。

初心：传承与创新

我从小就喜爱绘画，小时候拿着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一转眼，画到了今天。我一直都认为，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十分幸运

的，就是一个心无旁骛搞专业的人，几十年在绘画上下功夫，不断地摸索着前行，有幸取得了一些成就。今天看来，确实值得。

刚调到武汉画院工作时，我给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做一名专业的画家，画出像样的作品。当时和老院长中流老师交谈，他问我之后的创作方向，我坦言道西方油画讲求尽力写实，我想用中国画也做些尝试。

从古至今，中国画精要所在是表达作者内心之所思所感，表现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画面追求上以“写意”为重，“写实”效果一直不被历史主流所推崇，所以我走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咱们中国画的短板。秉承着“写实”的创作方向，在中国工笔画的领域，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反复尝试和探索。



李乃蔚作品《李自成进京》

这条道路的探索异常艰辛，正因为历史上没有范本，我给自己定下的艺术追求便也无从下手。这中间有一个度的问题，中国画强调用线，一根线下来，浓淡干湿，哪里该重，哪里该转折，有明确的章法。所有的技法，包括渲染、色彩、人物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人物和环境的表现手法，都有传统绘画的一套理念。

这个度是否能把握好，首先取决于创作者对于这个度的理解和认识。有时候常常是过犹不及，如果运用过了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效应。这当中需要创作者有些思考，有些想法，有些追求。

中国画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艺术体系，传统的概念必然随着画家观念的更新而拓宽内涵，向着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方向发展。我摸索了几十年，不停地考虑怎么样画，凭自己的感觉不断地尝试。但有一点是我坚持把握的，到今天来看是把握对了——始终不脱离中国画的技法和材料，以及把握整个画面的中国画味道，脱离

这些就不是中国画了。

在继承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我最大限度地借用某些西方古典油画的技巧，创造出工笔淡彩的透明画法。这一画法跟欧洲早期油画的技法坦培拉（Tempera）类似，达芬奇画蒙娜丽莎就是运用的坦培拉，它不是用油料调颜色，而是用鸡蛋清调颜色。中国画的标准，专业上要求薄中见厚。与西方油画通过颜料的堆叠不同，中国画就是靠每一遍透明颜色透叠出来，一层一层地加上去，一遍一遍地渲染，最后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后来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我的工笔画作品《银锁》获得银奖，获奖作品随团赴日本展出时，日方选用了《银锁》作为展览海报。时隔十多年，某次在北京的活动中，我邀请中国美协的一位领导出席，面对面听到以下一席话：

《银锁》当年在日本展出，令人为之一振，日本人看后竟不相信这是一张中国画，他们认为中国画不可能如此写实。日本



李乃蔚作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人对中国画是太了解了，他们的老祖宗就学中国画，因此他们不认为中国画能达到这个极限。我还听闻日本有的画家、专家用手去摸它的材料，他们质疑究竟是不是用纸本绘制，是不是使用中国画颜料，甚至怀疑是不是水粉、丙烯。

这个事情于我是一个褒奖，亦使我加深了一个认识：恪守本土的技法。无论画出来多么写实都不要紧，只要我的技法跟材料恪守传统，我就是地道的中国画。

这件作品代表中国画为国争了光，反映出在这个时代，中国画仍有它的创新、推进，证明中国画不是一个保守的画种。中国画可以像油画一样把人的血肉表现得如此真切，如此细微；中国画以其胸襟，可以学习西方油画的写实精神，在表现真实的同时，体现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和深度感。

并进：工笔与水墨

我早先年就是以画工笔画，准确来说是以工笔人物画而出名的。1997年，《山菊》获得全国首届中国画人物画展银奖（最

高奖）；两年后，《银锁》又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

与此同时，我还创作了《秋语》《生日》《归云》《停云》《染秋》《清风》《清音》《聘》《驿》《流年》《百合》《红莲》《蓝花花》等一系列工笔画。这些画作都是以极致的写实手法，表现出人物的内在神韵，创作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因此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画家的一般规律是年轻的时候钟情工笔精细画，年纪大了喜欢画大写意，但我反了过来，年龄越大越想往精细走。我一直专攻工笔人物画，习惯用线描来画水墨，所以我的水墨写意画会比较偏工一些，呈现出些许“兼工代写”的特点。遵循着专业的轨迹，工笔也能画，水墨也能画，在近几年，我有两幅水墨画的创作，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项目。

2013年，中国文联、文化部、财政部三个部委一起举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全面启动。这一工程将中国历史重要节点上的一些题材进行梳理。全国最

后入选的有146件作品，包括国、油、版、雕四个画种。国画只有61件，湖北地区有2件入围，其中就包括我和儿子李洋一同创作的《李自成进京》。

《李自成进京》宽度是五米四，高度将近两米七，画作中有近150个人物，每个人物互相之间需要彼此呼应，他们的肢体语言和神态都要有所表达。这幅画的创作时间跨度四年，严格来说我画了两幅。

第一张是初稿，我专门到东湖画室进行创作，用了两年的时间画了一个备审的小稿。用勾线和白描，没有上颜色，然后把图片发到中国美协，由他们的专家进行审查。初稿历经七八次专家审稿，收到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包括主要人物李自成在画作中位置不突出等问题。

中国画的特点是没法改，所以后来我又重画了一张。将李自成从队伍中间推到前面；把被俘虏的明朝大臣，改成明朝的宫廷乐队吹拉弹唱，让画作整体烘托出气势宏大、喜庆胜利的氛围。2022年，经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专家委员会投票评审验收通过，《李自成进京》予以收藏。

2021年，为迎接建党百年，省委宣传部交给我一个特别的主题创作任务，即创作革命历史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和风采，我查阅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的史料，还去到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的宣化店采风，到大别山区精准扶贫点进行调研。下到基层，多了解民风民情，对于我们的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画是画在宣纸上，而且是生宣纸，它表现画面的分量与油画是不同的。因此，想要体现中国画的特色，也就是中国画的笔

墨、造型、线条、用色等等，这里面的构思我确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作品的尺幅很大，有八米长、两米八高，牵涉到复杂的战争场合与众多人物的动态、表情。如果想要表现出解放军英勇战斗的集体群像，就一定要使画面显得丰富，不能太雷同，也不能太直白。最后，我采取传统说法叫殿堂画（也叫厅堂画）的画法。这种画一般是挂在大众场合，让大家去欣赏。

当时创作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我在武昌卓刀泉附近专门租了一间画室。每天从家往返画室之间，横跨长江南北，早上开车去，晚上开车回。在画室创作时，经常一手紧扶梯子，一手挥着毛笔，既要注意脚下安全，又要追求画面效果。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不辞辛劳地精心刻画，往昔战争的烟云在头脑里面不断翻滚，似乎战士的厮杀声就在耳边回响。

在这样夜以继日的创作下，三个月的时间里如期完成了这幅八米长、两米八高，汇聚七十多位历史人物的大型战争题材作品。完成之后，画作受到中宣部和中央党史办领导同志的好评，称之为“史诗版的鸿篇巨制”。

坚守：和谐与传统

西画强调外在，中国画强调内在，从中国画中能够感受到人物的内在神韵。如果认真端详会发现，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恬静、和美、温情、和谐的，这个“和”字正是我一直所坚守的。

《银锁》画的是一名歌唱演员，当时和她一起拍照的另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我也用了，就是《红莲》里在后面划船的那个。之所以选择这些女性形象，是追求一种体现

东方女性传统文化的内敛、含蓄，而非欧美式的张扬。我表达的女性都是古典、安静的，没有动态、明确的表情。“无”，实际上是“有”，“没有”有时又代表了一切，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

《红莲》曾在2011年入选第四届北京国际双年展，被挂置中国美术馆显著的第四位展出。开幕那几天里，几位印度画家主动找到我，交流印度细密画和中国工笔画的相通之处。看了我的画之后又带我去看他们的画，问了我很多专业的问题，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宣纸、什么技法？我都一一解答。语言虽有隔阂，艺术却有共鸣。

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艺术家，在同一幅作品上，找到了同样的审美体验，这不能说是巧合，而正是艺术的魅力。中国传统艺术的东西，对世界其实很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和谐之美能打动外国观众，能够让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以和为贵”的民族情感和性格。

艺术最终是要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不仅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和谐，还包括创作过程中自身的和谐。如果没有其他的工作，我每天都是从早画到晚，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单纯，辛苦虽然辛苦，但是热爱，创作过程也是在锻炼身体。只要一拿起笔，开始写开始画，就会进入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注意力集中在笔尖，甚至画到某些时候还要屏住呼吸，不然那一笔就算废了，这个过程是不自觉的。

和杂技家、舞蹈家等不同的是，画家常常在60岁左右，才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综合素养。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勤奋，只要努力，都可以达到。但是作为艺术家来说，勤奋和敬业是必须的，这是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基础条件下，对艺术有

一个更加真切的理解，对自己的学术发展、学术诉求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潜心地做学问、搞专业，艺术创作是很虔诚的事情，社会需要文化艺术。现在很多艺术家都想走捷径，想寻找多快好省的方法，但中国画是无止境的，是需要永远追求、一代代传下去的。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能说我是大家、名家，这些都要靠后人来说，靠中国美术史来检验。

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有其特定的表达方法，只不过是因人而异，因性情禀赋而异。在这个价值观重塑和物欲弥漫的时代，我始终坚守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画笔上，也体现在行动中。

在担任市政协委员期间，我曾建议将汉口中山大道沿线闲置的武汉历史老建筑腾退出来，作为武汉美术馆的分馆，专门用作将来保存藏品的画库和举办固定陈列展的场馆，打造建立中山大道美术馆群。紧扣武汉城市主题做文章，将挖掘本土文化内涵、突出地域特色与展示艺术精品紧密相连。

这样不仅能唤醒老建筑新的活力和青春，也能成为武汉城市一道鲜明的风景线，为武汉人留存美的记忆载体。更重要的是，当若干年后，武汉地区要梳理现当代地域美术的发展状况，不仅有文字和影像资料的记录，还有美术作品的实物展示。行在当代，利在千秋。

传德传医，做有担当的中医非遗传承人

◇ 吴启梅（口述） 靖 涵（整理）

人物名片：吴启梅，市政协委员，新洲区人大代表、区民族团结促进会秘书长兼副会长，武汉刘三屋中医骨伤医院、武汉本祥中医医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屋刘氏正骨术”代表性传承人。

据《新洲县志》《刘氏宗谱》等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刘三屋刘氏由江西迁湖北黄冈举水河畔定居，第十五世刘本祥行医济世，结识了从河南流寓本地的戴金花老人，创“刘三屋刘氏正骨术”。自此，刘三屋刘氏家族以“医不叩门、仁心仁术、医道万千、唯德最重”的精神传承数代、行世近三百年，改写了千万病人的命运。

传承非遗医技，弘扬先辈遗志

我出生于鄂西一个土家族山寨，山村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使我从小就萌发了当医生的梦想。18岁那年，通过勤奋学习，我如愿考入恩施医专（现湖北民族学院临床医学院）。1997年，我被武汉市新洲区作为医疗卫生紧缺人才选聘至邾城中医骨伤医院工作，又因缘结识了“刘三屋刘氏正骨术”第九代传承人刘之浩，嫁入了这个在新洲传承了近三百年的中医骨科世家。此后，我便师从公爹刘桂廷学习刘氏中医正骨医技，开启了传承之路。

公爹刘桂廷，正是这专治跌打损伤、享誉鄂豫皖的“刘三屋刘氏正骨术”第八代传承人，刘氏祖传的正骨手法及中医药秘方在他的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推广。公爹之祖父刘楚樵因与民国时期时任湖北督军萧耀南“白马行医”的故事闻名于当世，有“接骨泰斗”之盛名，其“柳枝接骨”“画符治病”等传奇故事在鄂东广为流传，收录在《新洲民间故事丛书》中。民间流传：“一骑白马绝尘去，两河盛传仁医名”。公爹刘桂廷常对我们讲：“祖人骑白马行医济世，我如今没有‘白马’，只有‘医德’这匹马了。”

多年来，我牢记长辈教诲，通过对祖传正骨手法及秘方的研究，结合公爹刘桂廷提出的“重药膳、善治外、师法自然”等中医古法，定位在手法整合、杉树皮小夹板外固定技术及中医药方剂上传承先辈医技。2015年，“刘三屋刘氏正骨术”被正式列入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被确立为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进一步承继先辈遗志，弘扬中医药文化，并响应国家大力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我离开了公立医疗机构。在第八、九代传承人即叔伯兄嫂们的支持下，创立了如今的武汉刘三屋中医骨伤医院（二甲骨伤专科）和武汉本祥中医医院（二级中医综合），并在院内外广泛开展业务学习，培养了一大批骨伤科专业医护人员。作为武汉科技大学教学医院，我们还承担医学院校的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才的“继教”培训及大、中专生临床教学任务，为国内多所医学院校提供临床教学实训支持。

我始终认为，中医传统技艺和文化不



刘桂廷在世时向吴启梅（右一）等讲述家族故事

应作为“历史”束之高阁，应在不断地保护与传承、应用与实践、改良与创新中提炼思想，发展进步，造福人民，这是作为中医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使命与责任。

为了更好地发展刘三屋刘氏正骨传统医技，我没有落下在学术和专业上的钻研，撰写的多篇论文在省市级学术期刊发表，还参与编写《数字针灸学》《智能中医学》等专著，参加多项科研课题。

利用自己所学的现代医学知识，我将祖传医技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在传统中医正骨、杉树柳枝小夹板外固定技术等基础上，适时开展骨科手术，联合武汉科技大学等相关学者、教授率先在区内开展数字骨科、智能医学的应用，使得“刘三屋刘氏正骨术”这一中医传统医技与现代科技碰撞出了火花。

勇担社会责任，造福民众乡梓

作为医生，我始终牢记从医初心，刘氏先辈“医道万千，唯德最重”的祖训和第六代传承人刘楚樵“拒收黄金，只留白马”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十分深远。行医过程中，我经常下乡村，做公益，遇到困难群众时也

常常解囊相助。在创立医院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灵活的方式，利用正骨医技和医院资源做公益、行好事。

记得在刘三屋骨伤医院开诊那年，曾接诊一位家住新洲区双柳街的汪爹爹，他在背饲料时不慎摔伤，导致右肱骨骨折，来到医院时，身上仅有300块钱。汪爹爹在医院门口犹豫不敢进来，了解情况后，我主动减免了他2000多块钱的医药费，免去了老人的顾忌。在治疗之后，想着老人出行不便，我带领医护人员多次上门为其免费输液、换药、拆线。见老人生活贫困，还主动捐赠了一些衣物和粮油，每逢上门，老人都感动不已热泪盈眶。

2015年，一名来自西安的道姑不幸摔伤，在武汉医治效果不佳，听闻刘三屋刘氏正骨术的独特接骨手法，多方辗转找到了我。我热情接诊了她，并细心诊治，前前后后经过50多天的治疗，病人得以康复。后来我见她远道而来，生活拮据，情况也比较特殊，主动减免了2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并对她的病情进行跟踪回访。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我在刘三屋医院一楼大厅设置免费饮用中药汤剂的场所，坚持为老百姓免费发放中药汤剂。春节期

间，我和几位院长一起召开院内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将新建的院区无偿提供给新洲区委区政府用作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场所，并当即以书面形式写了请战书。

按照区防控指挥部的要求，2020年2月9日晚，医院正式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我也始终在抗疫一线，克服困难，帮助需要救护的病人。由于疫情时期的突出表现，我被分别授予“武汉抗疫表现突出农工党员”和“江城最美逆行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荣誉称号。

随着医院的发展，我经常带领医院义诊团队走乡村，访老人，为他们解病痛，送温暖。同时以医院名义，在区委统战部、省市市区各级残联的指导下与农村特困户、五保老人、残疾人等开展各种爱心惠民、公益慈善的活动，每年组织送健康送卫生下乡活动50场以上，累计减免困难户医药费200多万元，救济困难户、五保户达50余万元，捐资建校20多万元，以个人名义捐助扶贫数万元。

下乡多了，村民们都亲切地称我为“美女侠医”“新赤脚医生”。记得在2017年，楚天金报还因“美女侠医”的称呼对我做了专题报道。也正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关怀，让我得到诸多赞赏与荣誉：多次被新洲区卫生局评为“先进工作者”；2017年被新洲区知识分子联谊会评为“慈善之星”；2018年，被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武汉市文明市民”……

面对荣誉与肯定，我深知唯有更加努力前行！2022年上半年，在区委统战部、区卫健局、区残联等各单位的指导帮助下，



吴启梅在凤凰镇毛家冲村开展志愿活动



吴启梅（右四）在政协武汉市十四届一次会议合影

我利用刘三屋和本祥两家医院力量，积极响应武汉市新洲区统一战线“同心汇”社会服务活动，开展了为期百天的千人骨关节病筛查的大型免费公益活动，对骨病老年人患者进行免费健康检查和疾病诊疗，惠及千余人。

立足中医非遗，积极建言参政

随着刘氏正骨术和刘三屋、本祥两家医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和期望也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先后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新洲区人大代表，新洲区民族团结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在拥有诸多不同的身份、站在不同的平台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都应该不断思索，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为医疗卫生健康、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医药传统文化等工作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人民群众谋求更多福祉。

在市政协领导的关心指导之下，每逢“两会”召开，我便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和社会调研情况积极建言献策。2014年，我撰写的《解决儿童用药紧缺和用药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加强对儿童合理安全用药

监管的建议》提案还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批示。

而基于在中医药行业耕耘多年的经验，我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提升中医药利民服务能力的建议》提案，

从政策引领、阵地构建、人才培养、中药材保护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助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与发展。

今年5月，我还随市政协主席杨智及部分市政协委员一起，在新洲区问津书院、凤娃古寨、仓埠古镇等地调研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收获颇丰。

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我同样积极响应，主动参与。2022年，在区委统战部、农工党新洲区支部、九三学社新洲区支部等的指导支持下，通过借助医院建筑优势，于武汉本祥中医医院行政楼专门开辟位置，建立了农工党党员之家，通过设置办公区、会议室、阅览区、展览区等打造学习交流、汇聚共识的“凝心之所、温暖之家”。

无论是作为市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农工党党员，还是中医非遗项目传承人、医务工作者，我深知自身还有诸多不足，但我也同样满怀信心。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唯有始终牢记初心，筑牢信仰，秉承“传德传医，造福民众”的刘氏正骨传承宗旨，力争为时代和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汉派服装的抉择与坚守

◇ 陈 飞（口述） 闻 夕（整理）

人物名片：陈飞，上海人，武汉市合荣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市服装协会副会长，武汉市设计师协会副会长，湖北省服装协会副会长。

上世纪 80 年代末，许多武汉本地小企业依靠贴牌生产、外贸加工掘到了第一桶金，并据此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一批“前店后厂”的服装加工作坊在汉正街如雨后春笋兴起。1991 年武汉的服装企业还不到 200 家，1994 年就猛增到 1500 家，巅峰时期多达 2000 余家。汉派服装，一度与“粤派”“杭派”齐名，三分天下。

彼时，一个叫赵合荣的企业家创办了一家非常传统的汉派女装企业——武汉市合荣服饰有限公司，生产接地气的中老年女

装，在汉正街自产自销。那一年的我正在上海读高中，但是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让我与武汉、与服装行业结下不解之缘。

上海还是武汉？

我父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到内地建设军工企业，并在山西晋城结婚。我出生后一直由上海的爷爷奶奶照顾，直到在上海上完小学三年级，爷爷突然去世，我回到山西晋城和父母团聚，在那里一直读到初一。1990 年父母调回上海，我跟随他们回到上海读完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大学期间，我当过班长、体育部长、学生会主席，也当选过校三好学生。

毕业后，和很多上海人一样，我怀揣梦想去了德国，在德国萨尔州立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获得 MBA 学位。在毕业前夕，我认识了现在的夫人。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德国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居世界 500 强的德国大型国际化工企业。3 年后，我从德国巴斯夫企业的总部调至上海亚太总部，从小职员升至油漆树脂部门的全球营销经理。2003 年，我在上海的年薪就有 60 万人民币。此时，我夫人回到武汉跟随岳父赵合荣学做服装生意，我开始上海武汉两地跑。期间岳父岳母多次邀请我加入武汉公司，但我适应了国际公司的节奏，晋升到目前的职位付出了很多努力，舍不得离开。

上世纪 90 年代，北方的服装企业没有南下的意识和能力，深圳当时才刚刚开放，全国还没有出现强势的服装集群。武汉依靠优势地理位置，在服装的款式设计方面，紧跟深圳、香港的潮流趋势。

依靠爆款快速反应让当时的汉派服装在市场上风生水起。所谓“快时尚、平民化、物美价廉”是当时汉派服装的最大特点。当时的汉正街，早上买样，下午这款服装就能卖出去。

进入 21 世纪后，汉派服装显出疲态，单纯需要“服装”的年代已经远去，国外品牌抢滩中国市场。面对外部强力竞争，汉派服饰竞争力锐减，只得被迫不时进入大肆甩卖、打折的状态，让本地市场更加内卷。

妻子经营的艰辛我看在眼里，疼在心



2012 年北京服装博览会留影（后排右五陈飞）

里，最终我离开了德国公司，于 2006 年 9 月份加入了武汉市合荣服饰有限公司，开始了两口子的共同创业。

高大上还是接地气？

每一个服装人心里都有一个品牌梦，都希望能打造一线高端服装品牌，震惊全世界，我也不例外。2014 年，公司曾经尝试做一个高端品牌，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很多一线品牌的运营和商品开发知识，并花重金聘请国际知名产品设计师，举办时尚秀。但随着越来越了解女装品牌运营的基本常识，我们对自己品牌定位以及产品开发的短板有了清晰认识，最终我们只是设计了一款产品，没有把这些产品投入市场。

很多和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汉派服装企业，由于想创立品牌，先后在深圳设立网点，但运营结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几年以后都关闭了原来的高端品牌，回到现有的批发品牌运营中。

“快时尚、平民化、物美价廉”是汉



陈飞参加 2022 年羽交会

派服装的最大特点，营销上则有“质高价不高，经销短、平、快”的特色。高端品牌纵然高大上、利润厚，但民生服装产品市场更广阔，我们的渠道体系更成熟。

这一次高端货品开发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应该服务好哪些品牌客户，做好哪些客户的产品研发，认识到应该聚焦自己的设计力量，重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10 年前后，基于羽绒服的巨大市场潜力，公司开始设计和生产羽绒服产品。那个时候武汉市女装企业里面能够独立设计和完成高级羽绒服的屈指可数，我们算是比较有名的一家，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

在羽绒服这个板块中，合荣服饰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很明显。我们在设计投入方面力度很大，拥有一年四季专门研发羽绒服的团队，时时关注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并对这些产品进行提升和改良，确保了品质的同时，款式力求时尚简约，经典大气。每年还会去往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等地调研，了解每一季最新的国际流行时尚元素，借鉴优秀的设计元素和面辅料细节，运用到我们的产品上。高级辅料加上各种时尚

配饰，使服装真正体现出其非凡的价值感。同时我们结合自己的版型和自身的产品研发特色，更好地服务好客户群体。

2005 年到 2014 年，合荣服饰相继研发推广出羊毛棉服和驼绒棉服系列产品。这个产品在全国市场一共也只会有一两家厂家能够生产和制造。作为一家汉派服装企业，我们充分享受了蓝海市场的竞争红利，期间企业高速发展。2010 年合荣服饰自主建成了 20000 平方米的生产基地，一举成为华中地区第一批利用全自动设备生产自主品牌羽绒服的女装厂家。公司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和管理水平，能够确保旺季货品三天出货，以满足客户第一市场需求，实现销量最大化。

2011—2013 年，公司在我的带领下连续三年作为汉派女装的名片，参加代表中国服装行业最高水平的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招商业绩。公司随后也大力拓展自营市场，先后建立了 60 多个自营卖场，拓展了上百家加盟客户。

劳动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

在惯性认知中，服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粗放型产业，而在我看来服装行业是一个妥妥的高度知识密集型行业。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什么样的衣服能够被客户接受，什么样的衣服能够触及消费者内心的审美，成为她衣柜中还没有的那一件时尚单品，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

在德国巴斯夫，我比较清晰地了解了一个跨国企业集团化、国际化的运作，收集了很多管理经验。特别是德国人的精细化管理，对我管理合荣服饰这家汉派服装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德国企业总是选择深入研发某一个专业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然后围绕着这一成果销售高毛利的产品，也就是所谓的蓝海产品。他们很多产品的毛利率都超过100%。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是跟随着他们做产品，延续或者抄袭他们的产品。在此过程中，大家用规模 and 价格来竞争，毛利也很低。巴斯夫的经验告诉我，作为企业家，应该在一片红海中找到自己公司的定位和方向。

随着电商的发展，消费者的购买认知发生变化，这对服装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以羽绒服为例，以前没有电商的时候，大家对一件羽绒服认知价格是七八百元，如今淘宝、抖音等平台将这个认知可能拉到了四五百，甚至更低，这些变化倒逼着企业去提质增效。

一件衣服由面料、辅料、做工、版型、设计细节、价格几个方面组合而成，作为一个生产型的厂家，要充分了解每个客户的喜好，客户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价位段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以前一个爆品走遍天下的现象不再有，南北差异的产品越来越明显。例如北方的羽绒服就要比南方的长两寸，新疆地区的羽绒服面料要比其他地区厚。

在内部管理上，公司延续了德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各个岗位都建立了良好的管理标准和流程。对品质的把控是公司管理的



合荣服饰羽绒服服装秀

重中之重，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自己摸索研究的羽绒服生产工艺在行业内成为了标杆。

在市场定位上，我们专注于三四线城市，年龄在30—60岁的女性。在我看来美丽不是年轻女孩的专属，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美，每一种身材都值得被重视，每一种美都值得被挖掘。我们旨在用好的产品让每一位女性客户，都能更好体现自己的优美气质。

中国时尚行业的迅猛发展，造就了合荣服饰和我的成长。可以说合荣服饰是汉派服装的缩影，不管环境怎么变化，在不断的抉择和坚守中顽强生存，积极向前。未来，我们将继续在渠道和产品风格多元化上发力，做到拳头产品，特别是羽绒服产品能从中年延伸到年轻女性，服务更多对品质和审美有更高需求的客户。渠道上力争在全国主要批发市场有自己的分公司，在主要的百货公司有自己的柜台，不断发展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

父亲涂允成的从教与治水生涯

◇ 涂光瑜

我的父亲涂允成（字述文），1903年12月11日出生在湖北黄陂县鲁台镇涂家大湾的一户农家。父亲一辈兄弟姊妹九人，他排行第三。祖父念过书但无功名，而且去世很早，家里靠曾祖母操持。

父亲幼年即离家到武昌求学。祖父和祖母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人，所以父亲和叔父很早就出来读书。5个姑母也都上了学，其中3个读师范，二姑母上北京女师大，九姑母上武大，她们都没有缠足。在20世纪初，女子上学且不缠足，可见祖父和祖母的思想颇为开明。

父亲从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心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继续刻苦攻读，1924

年考取唐山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读到三年级，因家中经济接济不上，加之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当时唐山交大的课本都用美国原版，他买不起，除了主修课如水力学之类选购“二手货”外，其余均靠笔记与借阅。

1929年从唐山交大毕业后，父亲到湖北省水利厅从事水利工作，任技士。1931年考取湖北省官费赴美求学，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获硕士学位；后转入依阿华州立大学，专修水利工程，获博士学位。1935年学成归国，受聘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教授，开出水力学讲座。



1935年，涂允成任北洋大学教授

任教武汉大学 西迁乐山选址

1936年，父亲受聘武汉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从事教育事业的最重要时期。武汉大学是华中最高学府，设有文、法、理、工四院（还酝酿设立农学院，聘请汤佩松先生主其事，后因抗战爆发而中止）。工学院下设土木、电机、机械等系。父亲在土木工程系任教10年，讲授水力学、水利工程、水工计划等课程，当时工学院教授水利的仅他一人。

父亲一向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上课时教室安静无声，学生聚精会神听讲，下课后有疑难问题请教，他都不辞烦劳，一定要讲清讲透，使学生理解贯通方罢休，赢得了学生的敬爱。

执教期间，父亲还创办了水工实验室，购买了实验水压力、水阻力的多种设备，供学生实习之用，由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管理。即使武大因战乱迁到四川乐山，水工实验室仍能做实验。他出的水力学习题，

要求掌握运用水力学的原理方能计算解答，这些都为培养高级工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他在武大的教学作风和教学质量，是有口皆碑的。

父亲除了讲学之外，业余喜欢文史书画，广交朋友。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教授、余炽昌教授（唐山交大同学）、赵师梅教授等经常过从，文学院刘博平教授、理学院萧君绛教授等时相往来。萧先生是数学系教授，业余钻研中医，收集古近代中医典籍并善切脉，师生中有患小毛小病的，经他诊治其效如神。父亲广为交友，善结人缘，为日后他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创办武大附中提供了帮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1938年，武汉大学迁往乐山，父亲作为最年轻的教授，参与组织全校向大后方转移，自己最后一批撤离珞珈山。作为迁校先行小组成员，他先期到乐山为选址做好安排。

武汉大学具有相当规模，举校西迁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当时条件下，从一个大城市迁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偏远小县城，其工作的浩繁和艰辛，其间所遇到的困难和周折，真是难以想象。他为武大选择好校址，也为我家在乐山邬鄢街“爱吾庐”一家绅士的宅院选定住处。1938年，母亲和大姑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乘重庆招商局“江新”轮西迁。

当时武大决定，除了四年级暂不搬迁留在原址上课外，其他班次一律迁往乐山。每个系留下两名教授给留校学生上课，土木系留下的是俞忽教授和我父亲，他们1939年最后一批撤到乐山。

因为有组织迁校的经历，到乐山后的一段期间，父亲兼任武汉大学总务长，参加校务委员会。校部设在文庙，工学院则在高



抗战期间，涂允成（左一）与武大同事赵友梅等在四川峨眉山

西门，他每周除了几次到工学院上课外，还要到校办公室处理一些重要事务。

创办武大附中 战乱兴学育人

武大迁到乐山后，教职员子女在当地求学，而乐山只有几所中学。我的长兄光辉当时12岁，考进了乐山郊外的嘉属联合中学，后来这所学校迁到夹江，他又到江津上过国立十二中。武大的教职员迫切希望有一所好中学，让子女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

1939年8月19日，乐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为躲避空袭，乐山原有的中学纷纷迁到附近较小的县城，异地上学更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同时，由于战乱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使得本不宽裕的教授们交不起学费、

食宿费，就近求学成了大家的强烈愿望。

同时，遭到日军轰炸后，人们住到郊区或乡下，学生上学就更困难了。我家也搬到了城西乡下的辜李坝，同住的还有后来父亲离开武大时接任武大附中校长的法律系蒋思道教授一家。1941年，我家又搬到岷江对岸山头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庄陈庄。子女辍学，成了教职员心上的大问题，迫切要求有人出面就近办一所好中学，以便子女在家中吃饭、就地入学。

在武大教授中，主张办学最力的是萧君绛教授，他对我父亲讲：

“我们为国家造就人才，而我们自己的子女却只有在家里呆着的份，心实不甘，希望你能出来办一所中学，以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武大教授陈源（即陈西滢，文学院院长）、

方壮猷、刘博平、黄焯、刘正经和俞忽等都有这个愿望。乐山商会会长范倜生及地方知名人士蒋焕庭等先生也有此意。那时，父亲年富力强，交游甚广，常有教授们相约过江来我们家商谈办学的事。又由于有迁校先遣工作的经历，父亲结交了许多地方人士和军政人员，这也为筹办武大附中创造了条件。

父亲出面约有这一愿望的家长开了几次会，上海银行乐山分行彭经理拿出300元的支付折子作活动经费。开过几次会，这300元用光了，办学校仍无头绪。最后，父亲提出：如果不办，参加会议的人每人摊一份茶资，还了上海银行乐山分行的帐了事；如果要办，大家得再努一把力。大家商议决定要办，经过乐山地方人士范倜生、蒋焕庭先生的努力，筹集了8000元的开办费。

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说：武大教职员子女入学问题，教育部是知道的，但私立中学立案是四川省教育厅的事，还是得满足郭有守提出的要求。好在此后，成都有周君亮向郭有守疏通，乐山又有地区专员、黄陂同乡柳维垣的支持，郭有守没有催办，柳维垣也没有执行查封，但学校仍处在没立案的状态。

1943年下半年开学，家长们着急了起来，因为学校不立案，学生不能考大学，于是联署向教育部吁请。父亲又专程到重庆找吴俊升，并设法找了教育部常务次长余井塘。最后，教育部在批复吁请书时，将“私立乐嘉中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私立乐嘉中学”，简称武大附中，“每年补助经费8000元，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为止”。

武大附中草创之初，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校址在乐山铜河扁（当地人称大渡河为铜河，岷江为府河），就是临大渡河的一条街。这条街上有一座凋敝的庙叫龙神祠，借用之后稍加修葺权作校舍。进得庙来，简陋的房舍，左侧几间做了教室，右侧几间当了办公室，中间一块小小的空地作为学生课余活动的场地，可以打打排球。再往上走，高处两厢也有几间教室，教室外的走廊就是下课后活动的地方。后来班次多了，又借用九龙庙扩大校舍。这个庙比较大，巷子对面还有较大的操场。

武大附中虽然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困难，但是教员阵容很强大，校风、学风十分严谨，因为从一创办就有遭查封的危险。作为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父亲认为只有把学校办出特色和影响来，学生功课扎实升学率高，上面要再查封，必遭致社会广泛反对，学校自然赢得同情和支持。所以，从初创起

就治学严谨，严格升留级制度。学校纪律很严，考试就更严。每逢招生考试或期末考试，父亲总是抓得很紧、很具体，严格淘汰制，两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包括一些教授子女。一位系主任在学校很有影响，对他女儿留级很不满意，但父亲还是按校规处理。另一位曾经鼎力支持办学的地方人士的女公子，也因学习成绩留级。父亲秉公办事，不循私情，当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父亲从筹办开始就延聘了一批有经验、有事业心的教员执教，他们大多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讲师、助教，受聘兼课，对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有张远达、夏振东、余先觉、吴静仪、吴熙载、陆维亚、刘博平、黄焯、缪琨、赵君貽、李格非、杨人绠、余名汉、罗明、许海澜、姚梅镇等。教务主任先后有张远达和王功品，训育主任先后有缪琨、李格非和夏振东。职员虽少，但办事效率很高，事务处仅有刘开诚和张云阶两人，教务处有刘光厚，训育处有傅如，无不兢兢业业。

张远达年富力强，事业心强，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除主讲数学课外，在初创时任教导主任兼高一班班主任，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是校长的得力助手，功不可没。

父亲作为一校之长，是以“严师”出了名的，从早到晚扑在办学上。他经常巡视查堂，观察了解教员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一次，许海澜（后为武大外语系教授）正在高一班上英语课，学生孙法理和同桌陶坤（武大教授陶因之子）在下边说笑。下课后，父亲对这两个学生严厉批评并给予处分。几十年后，已成为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的孙法理回忆往事，不禁感慨系之，说他是永生难忘的；当了华工附中校长的刘敬

黄回忆说：“我们当时很怕涂校长，有时迟到了，就低着头往教室里冲，生怕碰到涂校长，挨‘刮’（批评）。”

武大附中对课堂教学高质量严要求。语文讲唐宋八大家名篇，代数讲范氏大代数，英语除选读英文原版名篇和“读者文摘”英文版文章外还学整本的文法。课外也有要求，如每个学生必须写周记、练大字。后来在郑州工业大学任教的俞宝贞教授回忆说：

“如果不是涂伯伯当年在附中让我们练大字，否则我的字要比现在更差。”

武大附中良好的校风，还表现在尊敬师长、爱护同学方面，提倡同学和睦相处，反对无益争吵。我的长兄光晖在高一班读书，平时喜欢写文章、办壁报。一次，他在壁报《竹林》发表一篇杂文，其中一句说“曹操是个奸雄”。高一班上有个女生，上海人，年纪大一些，为人比较厉害，怀疑这话是说她的，向我父亲告状，说涂光晖骂她。语文老师缪琨上课时带话：“涂光晖，校长叫你到办公室去。”我长兄一进办公室，父亲不由分说动手就要打，被老师们劝阻了。事后，马上张贴一张大布告：“查高一班学生涂光晖，在文章中含沙射影辱骂同学，经研究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以惩效尤。”父亲作为校长铁面无私，在附中是有口皆碑的。

校长管理严格，教员教书认真，学生读书用功，武大附中在乐山远近闻名。武大附中追求的办学目标，是向重庆南开中学看齐。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教学成果斐然，学生成绩优异。1944年第一届高中毕业时，全班21人全部考上国立大学，有的同时接到两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在抗战时期高校较少的情况下，这样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实属罕见。

一炮打响，名噪一时，四川省内五通桥、

荣县甚至远到成都，都有不少学生慕名前来乐山，要求转入武大附中，一时应接不暇。

1944—1946年，初中毕业六个班，高中毕业五个班（半年一期）总共几百人，升学率很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为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高一班的王云从，后来参加了武大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运动；高一班的史长捷，解放前夕参与组织保护武汉电信局资产；高二班的曹葆铭，解放后成为人民日报驻武汉记者站站长，写下不少新闻报道和优美的散文。

武大附中的许多学生学有所成，不少称得上佼佼者。以高一班为例，最突出的要数欧阳予，考入武大电机系，1953年赴苏联留学，1957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设计大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秦山及恰希玛（巴基斯坦）核电站项目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史长捷，在高一班时就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年年评为第一名，从武大毕业后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成了知名专家；另一位高材生赵宗人，考入上海交大，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曾任华中电管局调度局副局长；还有熊性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孙法理，西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研究莎士比亚的知名学者，一本又一本翻译出版外国名著；王云从，曾任中国体育报副总编辑，她对武大北京校友会贡献良多；段华文在乐山任中学数学教员，凭着附中三年受教于张远达的基础，成为乐山地区著名的数学教师。

父亲在武大教书育人、精于管理，并创办武大附中，从严治校，培育英才，表现出极强的事业心和极强的行政能力。十年辛劳，成绩斐然，他的名字永远载于武汉大学和武大附中的史册。

担纲江汉工程局 加固汉江千里堤防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政府顾问、唐山交大校友朱泰信向民国政府中央水利委员会（后改为中央水利部）举荐，在涂允成和刘峻峰两人中择一担任江汉工程局局长，主管湖北全省的堤防水利工程。中央水利委员会选派我父亲涂允成就职，由此展开了专家治水的新一页。

抗战爆发前，江汉工程局由黄陂人范熙绩任局长。抗战期间，湖北省政府从武汉迁往恩施，江汉工程局则迁往重庆，省政府对此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范熙绩病故后，由陈湛恩接任局长，仍在重庆办公。陈湛恩辞职后，湖北省建设厅长谭狱泉兼任局长，这才将江汉工程局迁到了恩施。

父亲接到中央水利委员会的任命，1945年9月到汉口筹备接洽。11月，江汉工程局从恩施迁回汉口，父亲遂于11月正式接任局长一职。这一年，他42岁。父亲出生在江汉平原，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对长江怀有深厚感情；他又专长水利工程，回家乡从事水利建设，一直是他的热切愿望。他在接到任命后，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为桑梓服务是我多年的夙愿，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当竭尽绵薄之力，兢兢业业地去完成。”

江汉工程局是中央水利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一个工程管理机构，其业务范围是湖北省境内的江汉干堤的管理、维修及汛期防洪抢险等工作。对民堤的管理也属该局的范围，但重点在干堤。干堤总长约为1800公里，民堤约为12000公里。

江汉工程局全局设两室三科，即技术室和秘书室两室，第一科、第二科和第三科。第一科管总务、人事、文书、会计、出纳等；



1950年代的涂允成

第二科管工程；第三科管水文及测量。担任两室主任的有陈泽荣和王国康；担任三个科长的先后有李镜英、朱朝弼、潘廷梓、陆孝伦和李萼奇等。附属单位有两个测量队、八个工务所、十几个水文站及水位站。八个工务所分设在湖北省境内的汉川、仙桃（有时在岳口）、沙洋、黄石港（有时在小池口）、武昌、新堤、监利和沙市等地，负责江汉干堤及民堤的管理、维修及汛期防洪抢险等工作。父亲任用了一批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工程师担任八个工务所的所长，其中有王守先、黄炽昌、吴松香、林万明、涂卓如、陆银如、余传周、冯长儒及黄守楷等。他们为江汉堤防及防洪抢险付出了极大努力，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水利工程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水文站及水位站，有的设在工务所在地，也有些单独设立。局本部职工70人，加上附属单位的300余人，共约400人。

千里堤防本来就残缺不全，加之年久失修，连年水患成灾，到八年战乱，更是破坏得百孔千疮。父亲到任后，一面四处奔走，向水利部和湖北省政府要钱，一面积极组织工程局所属各工务所修补、加固堤防。父亲

办事一向认真细致，事必躬亲。每年冬、春两季抢修，他都亲临现场巡视，指导工程施工；每年夏汛、秋汛更是大忙季节，遇到险情，他都亲自上堤，日夜坚守，指挥防汛抢险。汛期他经常出差，一离家就是十天半月。一遇工务所告急，长江、汉水出现险情，他都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投入抢险。每到此时，长江、汉水两岸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都系于一身。一旦大堤失守，愤怒的百姓甚至会把堤防官员扔到江里喂鱼。从1945年起，在他担任江汉工程局局长的5年里，由于他和同事们兢兢业业地工作，湖北省的江防未出现大患，每年都平安度汛。

毅然留在武汉 心系水利事业

1948年冬，中共派地下党员徐仁（族兄涂光鼎的化名）向父亲分析当时国内时局、介绍统一战线政策，劝他留下来为人民政权工作。光鼎是我的族兄，两家的祖母是同堂（叔伯）姊妹，他的祖父是进士出身，我家从黄陂迁到武昌之初，即住在武昌“静宜别墅”他的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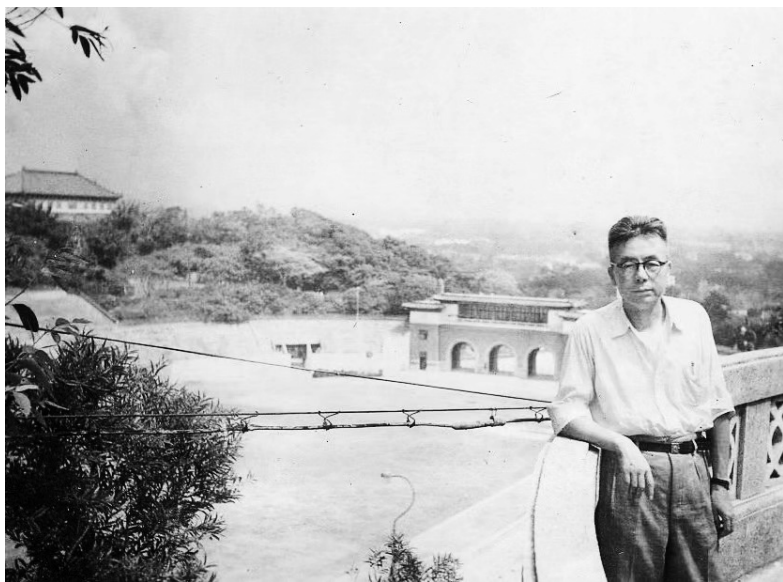
1949年春，父亲毅然留下来。徐仁向我父亲索取了这一年的江汉堤防的工程计划，并将其转移了出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亲完整保留了湖北省内长江、汉江各水文站宝贵的历年水文资料，同时保留下来一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和工程器材、设备物资。

1949年夏，武汉遇大汛。武汉军管会要我父亲和江汉工程局全体人员坚守岗位，立即投入防汛，移交工作等防汛结

束后再办理。军管会派徐觉非任军事代表前来接收，他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当你的局长，技术上由你全权负责。这一年，武汉汛期水位虽然很高，洪水凶猛，但由于父亲和工程局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终于安然度汛。事后，在一次会议上，军管会主任谭政高度赞扬了江汉工程局全体人员和父亲，表彰他们成功抵御了洪水的侵袭，为武汉人民作了一件大大的好事。《长江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1949年秋，武汉防汛胜利结束，年底父亲办理完江汉工程局的移交手续。这之后，他应聘任华中农学院副院长并教授农田水利学。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由辛亥志士、黄陂人潘正道部长出面，聘请他担任农田水利处副处长，负责中南六省的水利工作。在此后的5年里，他主持并参与了规模宏大的荆江分洪工程，以及湖北省和中南六省区的水利规划及重点水利工程，足迹踏遍了重要水利工地。

1954年夏，湖北及武汉遭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江汉关最高水位达到创记录的29.73米，武汉三镇受长江、汉江洪水围困，



1950年代，涂允成出差途中

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处在危急之中。父亲受命担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部副总工程师，他与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一起，运用自己的学识和多年江防的丰富经验，参与指挥了空前规模的防汛斗争，积极出谋献策，现场指导施工。每当抢险关键时刻，他都出现在险工险段，最紧急的时候，他与防汛大军一起日夜坚守，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胡须长长的也顾不上刮。

1954年武汉防汛胜利后，中南行政区划撤销，父亲调任武汉市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任职期间，他对武汉防汛中暴露出的一些险段，采取了许多根本性的整治措施，还主持并参加规模宏大的武汉市郊东西湖围垦工程。1956年技术职称评定中，他被评为二级工程师。

1958年，父亲调任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任厅长），负责全省水利工程建设的技术管理工作。在杜家台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及省市许多水利建设工地上，都闪现他忙碌的身影。

作为一位知名的水利专家，父亲还多年担任湖北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热心参加水利科学界的学术活动及科学普及活动，主讲科普报告。

1962年，父亲作为知名民主人士调到湖北省政协工作，任副秘书长。他自1957年始，历任民革武汉市代主委、民革湖北省副主委和主委等职，1964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晚年，他在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中，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统一战线，为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和海外故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69年2月7日，他因积劳成疾而过早离开人世，终年65岁。

父亲一生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教育家，一生热心育才、严谨



1960年代，涂允成在汉口江汉饭店

治学，对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管理及武大附中的创建和发展贡献良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二是作为水利专家，一生潜心治水，兴利除害，胸怀万民疾苦，心系万众安危，对湖北省、武汉市及中南地区的水利事业竭尽全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作出过有益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开拓业绩将永远长留在我们心间。

涂光瑜，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允成三子，1941年出生于武汉大学西迁所在地四川乐山

中法建交“第一团”轰动巴黎

——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之一

◇ 何忠杰

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互致贺电。5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发表署名文章《继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中法两大文明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因此长期相互吸引、相互欣赏，在相互体验对方文化独特魅力中厚植友好民意基础，也为世界不同文明良性互动树立典范。60年间，武汉杂技团三次炫技法兰西，受到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李先念副总理请演员家中晚餐

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史上

的一个大事件，被外国媒体描述为“外交核爆炸”。

为了给刚刚建交的中法关系升温，两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商定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法国巴黎文学艺术社履行协议。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隶属于文化部的具有对外演出经营资质的国字号权威机构，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演出营运商。巴黎文学艺术社是法共党员索利亚领导的一家文化机构，该机构总经理隆布罗索先生是一位热爱中国和中华艺术的演出经纪人，曾于1955年起多次成功促成中国的京剧、杂技、歌舞、木偶皮影等艺术团到西欧、北欧演出，具有丰富的国际演出运营经验。双方在北京商签了执行中法建交后的第一个文化交流项目，选派武汉杂技团承担执行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定赴法访演的首发团任务。出访团冠名“中国杂技艺术团”，法国媒体称之为“官方艺术团”。



武汉杂技团参观埃菲尔铁塔

为了让这次建交后中国杂技艺术团的首访告捷，隆布罗索演出公司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提前半年派出宣传策划人员来武汉，拍摄采录大量的节目剧照和文字资料，并且以北京天坛和长城为背景进行摄制，制作成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开本演出节目宣传册。在杂技团到访之前，法方就通过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在全法国广泛宣传报道武汉杂技团的演出剧照和创作成就，并突出宣传夏菊花的《顶碗》艺术特色和她“人大代表”（类似西方“国会议员”）的不凡身份。可谓在舆论上做足了文章。

为了完成好这次重要的访法演出任务，杂技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为保证向法国观众呈现一台高质量水平节目，对舞台队、马戏队、少年队的演员，进行调配调整组成出访团，在武汉进行了100天的封闭式严格训练和排练，年青演员和老演员的协调配合默契自如，节目的技艺得到很大完善和提高。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国家投入了相当一笔经费装备武汉杂技团，演出道具，彩衣和舞台装置全都更换一新。国家还从财政经

费中，给每个演员拨发350元的“出国装备费”。大家用这笔高出月工资近十倍的钱，在北京“红都”服装店订制了一套中山装、两套西装，在武汉“茂记”皮鞋厂订制了两双小方头或圆头皮鞋，并在“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了衬衣、内衣、内裤、鞋、袜、牙刷、牙膏、肥皂等全部生活用品。

此外，中演公司还给每人租用了大衣、风衣和大小行李箱，可谓“全副武装”。

出访前，副团长申剑带着夏菊花等部分演员到中南海看望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李先念在湖北主政时，申剑是他的秘书。申剑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武汉杂技团要出访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情况，李副总理嘱咐申剑和演员们说：“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出国演出要注意纪律作风，要体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要通过演出宣传中国的进步，为国家争光。”李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还热情招待演员在家中共进晚餐。

经过精心艺术包装的晚会节目，在北京进行了汇报演出，受到文化部、中演公司领导一致好评。对外文委负责人宋一平在武汉工作过，他十分高兴地说：“武汉杂技团的节目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也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你们要好好保持节目的高水平，要为国家争光。”

1965年9月下旬，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郭坤和为团长，武汉市外办副主任申剑

为副团长的中国杂技艺术团一行 51 人到达法国。在巴黎，演出场地是法国政府为国际博览会兴建的夏乐宫国家大剧院。通常这里是西方的达官显贵们观看芭蕾舞、歌剧和高档音乐会的场所。

9 月 30 日晚，正值中国国庆的前夜，首演式特别安排在当晚举行。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和四位政府部长以及好几位前总理、前部长出席观看。几天后，法国外交部长和夫人也观看了演出。法国报纸称：“出席观看演出的政府部长们可以开一次部长会议了。”

拥有 2700 个坐席的夏乐宫剧院座无虚席。演出以演员们手持鲜花向观众们致意的

开幕式紧接“狮子舞”开始，舞台上两只威武的大狮子和四只欢快活泼的小狮不时逗得观众们阵阵掌声，尤其当一只大狮“生”出一只小狮的时候，观众们给这一别出心裁的趣味性表演逗乐了，甚至发出爽朗笑声。接下来，先后表演了《五人武技》《双蹬技》《杂拌子》《大跳板》《耍花坛》《双人切砖》《高车踢碗》《双爬杆》《晃板》《大武术》《地圈》《椅子造型》《车技》《顶碗》等节目。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杂技激起观众席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演出谢幕时更是激起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新华社记者李延宁以《成功的演出——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巴黎》为题，记述演出的盛况说：“在这一年里，巴黎人曾经为丰富多彩的巴黎博览会中国馆赞叹，为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出色球艺喝彩。现在，他们又为中国杂技艺术团的精彩表演叫绝。”“在 3 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这个巴黎最大的剧场仿佛变得狭小了，气氛也很热烈，每隔一两分钟，有时甚至半分钟，便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观众说，手掌都拍疼了。”报道说，巴黎新闻界一位老资格的记者与中国记者坐在一起观看首演，对整场演出赞不绝口：“我 70 多岁了，由于职业的缘故，也由于我家就住在剧院对门，几十年来，来巴黎演出的外国剧团我差不多全看过。可是我衷心地，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美好的演出。”

《法兰西晚报》更是用幽默的口吻描写演出情景说：“这是一场使观众筋疲力竭的演出，由于拼命鼓掌，人们走出剧院已经累得不得了。”

《法兰西时代报》描述说：“置身于剧场中，你可以感到观众由惊愕到兴奋的情绪变化，可以感到台下观众的心和台上的表



夏菊花表演《顶碗》单手顶碗



夏菊花表演《顶碗》脚面夹碗

演紧紧连在一起。当演员夏菊花头顶十多个大碗在板凳上以一只手拿大顶的时候，当杜秋丽顶着支撑在一个花瓶上的大桌子跳起红绸舞来的时候，当16个演员在一辆行驶着的自行车上搭起图案来的时候……，观众保持了绝对的安静，仿佛在帮助演员高度集中似的。只是，不时可以听到某些人脱口而出的典型法国式的惊叹语‘喔啦啦’！而当那个小滑稽——13岁的小演员吴卫民带着他的小红气球出场时，剧场内爆发出一片孩子气的笑声，使全场2700个成人观众终于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

法国各报的评语说：“政治态度不一的各报评论员对杂技艺术团的表演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它们把一大堆形容词，最高级的形容词，都用来描写中国杂技艺术团”。

《战斗报》说：“人们看到的是神奇的平衡，难以想象的迭罗汉和异乎寻常的技艺。”

《法兰西时报》说：“中国杂技艺术团，在这几个平淡的字后面隐藏着巴黎从未见过的最不平凡的节目。”

《文学消息》认为中国杂技团的演出是“本年度最佳的演出”。它在“不可能”这几个字不是中国字的标题下写道：“不可想象！没有看过中国杂技团演出的人，对什么是杂技根本不了解。每一个节目都是建立在难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的：后一个动作总是要超出前一个动作，把‘不可能’的范围缩小。”

《法兰西文学》惊叹：“不可思议，了不起，不可想象……全巴黎在品评着：闻所未闻，妙极了，惊人……在3个小时里，演出从未脱离灵巧艺术的顶峰。”

法国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地观看中国杂技艺术团的演出。法国公众对中国杂技艺术

团的演出赞扬备至，并不是由于法国人从未见过中国杂技艺术，因而好奇。恰恰相反，人们告诉中国记者，当年正好是中国杂技流传入法国100周年，法国人对中国的杂技是熟悉的。他们现在之所以深受吸引，用法国刊物《艺术》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中国杂技艺术团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家刊物写到：“当西方马戏团越来越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艺术家们作出了人们想象中所能有的最完美的杂技表演。这些节目都是古典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些节目演得如此细致精巧。”

一位观众将写着“中国万岁！”“毛泽东万岁！”的字条放到台边，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有许多旅法华侨，更是生怕错过了机会，早就订好了门票。巴黎金城饭店的老板让自己的员工轮流值班观看演出。许多老华侨激动地说，离开祖国几十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先生看完之后在剧院门口等待演员出来，热泪盈眶地说：“你们演得太好了，你们为我们华人争了光。今年是我们国庆16周年，我们真正感到16年前做华人自卑，16年后做华人自豪，太感谢你们了！”

这些报纸在赞扬演出的同时，还报道了中国政府对杂技艺术的关怀和对青年演员的培养。有记者称：“看过演出之后，使人想到在艺术家们身后还有一个百花盛开的国家。”记者们对夏菊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一事实，特别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杂技演员竟然当上“议员”，简直不可思议。一家报纸写道：“在西方，除了收税官员以外，政府是不管杂技演员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刊登夏菊花《顶碗》的艺术照，并赞美夏菊花为“顶碗皇后”。



马尔罗与夏菊花、黄镇大使（右二）交谈

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举行了高规格的宴会祝贺首演成功。马尔罗热情称赞武汉杂技团的演出“是诗一般的技艺，是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表演，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勤劳、不怕困难。”“看了你们的表演，说明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

演出经纪人隆布罗索先生在巴黎名胜埃菲尔铁塔的豪华餐厅举行答谢宴会，称赞“武汉杂技团以精湛的技艺轰动了巴黎”。

黄镇大使安排到使馆“包饺子”

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是一位将军出身具有儒将风度的外交官，对武汉杂技团访演十分关心也十分赞赏。黄镇大使安排我们在休息日到使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操一口浓重的下江方言，说话开头总要带一句“你们的时候”的口头语。他十分高兴地称赞：“你们的时候，武汉杂技团在巴黎的演出非常成功，大家演出不仅为国家争了光，也为我们大使馆争了光。为了感谢大家，慰问大家，我们大使馆特地请大家‘回家’来包饺子”。演员们尽兴地享受了一顿特别的“饺子宴”，在节目中担任底座的“大

块头”演员尹玉云，还创了吃下100个饺子的记录，成为一时“趣谈”。

这次在法国巴黎演出长达40天，还到了布尔诺、马赛、里昂和尼斯、蒙维利埃等城市访演，随后于12月下旬至次年2月顺访了意大利、瑞士，同样受到高度好评和热烈欢迎。意大利《时代报》还以“顶碗皇后——北京的一位女代表——中国杂技演员”为题，

赞扬“议员夏菊花是中国杂技团第一流的演员，她那天才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不仅在她的祖国闻名，也在世界上闻名出众。她表演的《顶碗》节目是真正轰动世界的节目，给欧洲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对武汉杂技团在西欧三国计95场演出，15万人观演所受到的赞誉和好评，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演公司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演出公司总经理丁波和副总经理徐澄波表扬说：“武汉杂技团是我们中演公司手中的一块‘王牌’，我们中演公司十分喜欢武汉杂技团的节目，武汉的节目有特点、有气势”“你们不仅节目过得硬，队伍也过得硬，我们要把武汉杂技团作为一支对外文化交流的常备出国团，你们要随时作好准备，一有任务，随时可以出发。”

这次成功的访演，使夏菊花赢得“顶碗皇后”的赞誉，也奠定了武汉杂技团在国内杂技界“四大名团”的地位，获得“世界名团”的美誉。

何忠杰，原武汉杂技团副团长

“咬文嚼字”黄鹤楼

◇ 张胜仪

春光明媚，漫步在黄鹤楼公园内，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大到一座拥到1800年历史的名楼，小到楹联匾额中的一个文字，无不反映出黄鹤楼文化的瑰丽多姿和耐人寻味。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人员，我深知文字内容的真实性、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及历史脉络的完整性，对一处名胜古迹来说至关重要，常常需要追根溯源推敲琢磨，不免“咬文嚼字”一番，从中探索黄鹤楼背后鲜为人知的文化趣事。

“三楚一厦”确有“厦”

在胜像宝塔前，立有“三楚一楼、江山入画”牌坊，是黄鹤楼公园的一处重要地标，也是游客必不可少的打卡之处。

牌坊正面题“三楚一楼”，由著名艺术家、武汉画院名誉院长、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长闻钧天先生书写，出自清人林以钺楹联“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之典故。但题字为“三楚一厦”，常有游客以为“厦”字写错了。

我曾受理一位老先生的投诉，他在电话里义愤填膺，说他查遍家里的字典，都没有找到这个“厦”字。我向老先生耐心解释：这个字确实存在，这样书写是书法家的个人喜好。同时，广字旁的厦形容在广阔无垠的空间里，黄鹤楼是独此江山独此楼。然而，老先生态度坚决，认为匾额误字严重损害历史文化名楼的声誉，要求公园立即进行整改。

为了寻找到更多与“厦”有关的信息，证明这个字存在和使用确实是合理的，我进一步搜寻各种可能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发现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缩印本《辞海》第1198页，“廛”字赫然在列，解释简单明了：“廛，同‘楼（樓）’”。

“楼”的繁体字“樓”作木旁，说明以前楼都是用木头盖的。而“廛”从“广”旁，在日常已不常用，或许仅存于书法领域，用以展示书法家的博学和个性。那么，除了闻钧天先生的“三楚一廛”之外，还有哪些书法作品也是如此呢？

带着疑问，我又继续查阅了一些资料，收获甚多。远如民国时期费公直有《变雅廛选诗图》，江阴名士张小廛其名为“廛”并著有《小廛画集》。近如武汉书法大家陈义经的楷书横幅“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大千的“泰丰楼”等，篆刻中如邓散木的印《天闻楼》、丁世峰的印《睥沧楼主》，其“楼”皆“廛”。可见，“廛”字确实客观存在，并且在书画篆刻领域，将“楼（樓）”写作“廛”的情况十分常见。

最后，我和同事一起再次向老先生解释，他终于表示信服，对我们也表示感谢。一个字背后的文化尚且如此丰富，更何况是一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名楼呢？这次经历也提醒着我，身边点点滴滴皆是文化，面向游客不仅要耐心沟通，更要“咬文嚼字”勤修内功。

“楼峰江带”并非“蜂”

“楼峰江带、烟生南浦”牌坊，立于黄鹤楼公园东区附近，其正面题有“楼峰江带”四字，取自清代佚名短联“楼峰江带，舟蚁人潮”。其中，“楼峰江带”中的“峰”，常被误作蜜蜂的“蜂”。

在某些网站和旧版旅游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上联写楼的雄伟，远观黄鹤矶头，黄鹤楼高耸入云，如蜜蜂展翼凌空；浩浩长江，如衣带相依相绕。下联写登楼所见盛况，



从高楼上俯瞰江中的船只像小蚂蚁，拥挤着蠕动着；人群像潮水涌来涌去。”

乍一看，上联第二字“蜂”与下联第二字“蚁”均为昆虫，好像对得上，仿佛说得通。其实不然，“楼峰江带”意在形容楼似高峰，江如长带，其意指黄鹤楼耸立在黄鹤矶头巍峨如峰，登楼远眺源远流长的大江蜿蜒如带。所以，这里应为山峰的“峰”，而不是蜜蜂的“蜂”。

那么这则短联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在查阅1980年代湖北旅游丛书中的《黄鹤楼》时，我意外发现了些蛛丝马迹。传说某一天，有个远方游客在墙上题写“楼峰江带、舟蚁人潮”八字短联，气势苍古，用语奇绝，很快引人围观，纷纷交口称赞。知

州闻讯赶到现场一看也非常欣赏，忙令人查访作者及其住所，意欲亲访。但找来找去，竟无其人踪影，知州只好快快而归。知县得知此事，误以为知州大人因此联动气，欲将作者抓来治罪，于是命人将短联通通刮掉。之后，知县兴冲冲邀功请赏，自然被知州大骂一通。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在古文献中能否找到相关记载？武汉“活字典”徐明庭老先生，在其著《老武汉丛谈》中进行了严谨周密的论证。按其提示，我查阅了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黄鹤山志》，在第三卷第70页“详异”中果然找到了相关记载，并注明引自《江夏旧志》。

经查阅对比，这段记载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乾隆江夏县志》第十五卷中的记录完全一致。基本证实了乾隆初年确有此联、确有其事，并非后人杜撰。只是后来传播的民间版本，与之略有差异。其一，短联写在黄鹤楼太白堂北碑亭墙上，而不是黄鹤楼墙上；其二，闻讯赶来的不是知州，而是乾隆八年至十年（1743—1745）担任湖北巡抚的晏斯盛；其三，乾隆《江夏县志·秩官》记载此间先后担任江夏知县的为陈钧和黄咏，陈钧任职于乾隆七年至九年，黄咏任职于乾隆十年，可推断派人刮字的非陈即黄。

“峰”与“蜂”虽一字之差，但如果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严格论证，而是靠二手资料或道听途说草率下结论，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

“银洲浩荡”巧改“瀛”

在蛇山高观山由西向东的山脊上，依次分布有春、夏、秋、冬四座青石牌坊。四座牌坊的横额上，正反两面各题有一句诗，描绘黄鹤楼的四季美景。其中，夏坊“荷风送香”、冬坊“银洲浩荡”两处，常常被认为“荷风”应是“荷花”、“银洲”应是“瀛洲”。

夏坊，西面题“荷风送香”，东面题“竹露滴清”。网上误读为“荷花”的比比皆是，有些旧版书也常将“荷风”误写作“荷花”。其实，这四个字与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紧密相关。孟浩然曾多次过江夏（今武昌），在黄鹤楼宴客送友，饮酒赋诗，“荷风送香”取自其《夏日南亭怀辛大》一诗。全诗词淡意远，诗味盎然，尤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两句，于轻描淡写中勾勒出清闲淡雅的夏夜情趣——微风轻轻吹动荷花，送来阵阵幽香，竹叶滴下点点露珠，发出美妙微响。细香可嗅，滴水可闻，诗人以“通感”的修辞手法，从嗅觉和听觉两方面描述出夏夜静谧清幽、不染尘俗的自然景象。蛇山多竹，历史上曾有紫竹岭之称，又多有盆栽荷花。夏坊横额题文即由此句简化而出，营造出清韵怡人、悠远恬淡的绝美意境。荷风与荷花仅一字之差，但其格调、意境及韵味却相距甚远。

无独有偶，冬坊西面题“玉树参差”，东面题“银洲浩荡”。其中，银洲的“银”字也常常被认为是写错了，游客提出正确的

写法应为“瀛洲”，那么究竟孰是孰非？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自唐以来，登黄鹤楼赋诗的文人数不胜数，但描写冬日黄鹤楼雪景的却不多见。杨基为元末明初诗人，其黄鹤楼诗现存三首，两首描写的均为黄鹤楼赏雪。洪武六年（1373），杨基奉使湖广，腊月十一日夜抵达武昌，其住所即在武昌城的湖广府内，距黄鹤楼很近。那天夜晚风雪交加，到了拂晓时分，积雪已有两尺多深，杨基趁兴到黄鹤楼欣赏雪景，满腔豪兴作诗《黄鹤楼看雪》和《雪中再登黄鹤楼》。

“玉树参差认汉阳，瀛洲浩荡迷鹦鹉”一句出自《雪中再登黄鹤楼》，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大雪中汉阳树参差难辨、鹦鹉洲掩映迷离的动人景色。“瀛洲”原意指传说东海神仙所居住的仙岛，诗中比喻鹦鹉洲。



匾额题文在撷取时将“瀛”改作“银”，寓意黄鹤楼冬日万里雪飘、银装素裹之景。读到“银洲浩荡”四字，脑海不由得浮现登临黄鹤楼时，眼前一派“满树梨花满江雪”的人间仙景，仿佛心意与仙人相通。“银”与“瀛”，虽然仅一字之别，但“银”字平添几分动人的想象空间，精妙地点出了黄鹤楼雪景之美。

“扬州”“杨州”有关联

一位游客发微博提出疑问，黄鹤楼三楼壁画中李白诗“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杨”字是不是弄错了，偏旁怎么写成了木旁？

其实，在古代文献中，二字常有混用，只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用“杨”确不多见，但不算错。在查阅的过程中，发现古籍中二字似乎有某种特别的联系。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扬州宜杨，荆州宜荆。”按照沈氏的说法，或因其地宜植杨而多杨，故谓之“扬州”。今人韦明铤在其著作《扬州掌故》认为“扬州”的“扬”，古时本作“杨”，并举出了许多实例证明。如：《史记·天官书》“希牛婺女，扬州”，又《三王世家》“扬州保疆”；《汉书·何武传》“扬州太守”，又《王莽传》“大将军扬州牧”；《汉冀州刺史王纯碑》“出使扬州”，又《魏公卿上尊号碑》“领扬州刺史”，皆作“扬州”。清代学者朱起凤先生说过：“扬州之杨，字本从木。晋王献之《进书决帖》‘艺食扬州市上’，字从木旁作杨，可证也。”可见，“扬州”用“杨”字自有来历。

为了进一步理清古代杨、扬二字的联系和发展，经查阅文献资料，在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清毕沅作注疏的《释名疏证补》

中，进一步找到了资料佐证。《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目前发现有关“扬州”方面最早的记载，即出自此书。汉李巡曾有注解：“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故曰扬州。”清叶德炯提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记载：“东南曰扬州，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原文出自《周礼·职方》。

古代江南江淮、苏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辖，及江西、浙江，西则河南之汝宁、湖北之黄州府，都是古扬州所管辖的范围。这些地方都在今天江淮湖水之间，所以古人称扬州界多水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春秋元命苞》说“地多赤杨，故取名焉”，也是从木旁取义。晚唐李匡乂在《资暇集》说“地多白杨，故曰扬州”。无独有偶，清人苏舆曾说“扬，古本从木”，由此提出“水波扬”而无“杨扬也”的解释。虽然，上述说法也曾被后人辩驳，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文献中杨、扬二字确实经常混用，没有绝对的对错。

张胜仪，武汉黄鹤楼文化中心文博馆员

库里申科和他的大队长战友们

——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追踪之三

◇ 谌达军

提及苏联空军志愿队，人们大多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库里申科”。可是，我在寻访中发现，库里申科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形象符号，由于历史的隐秘，对他援华抗战事迹的追怀，大多时候也只是一种情感性记忆，还原他全面而具体的史实颇为必要。

意外发现“英雄大队长”

2010年5月，中央电视台大型公益寻亲节目《等着我》开播，开始走进中国百姓的情感生活，为许多家庭圆了“寻亲梦”。这档引自俄罗斯的同名节目，首期内容便与俄罗斯有着直接关系。

节目开始，一位名叫朱育理的中国老人，要寻找他50多年前留学苏联时的大学

女同学依娜·库里申科。这位女同学的父亲，就是1939年援华抗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远程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节目编导设计了戏剧性场景，连线的俄罗斯主持人说：“朱先生，我们的制片人谢尔盖先生要跟您通话。”

电视画面切到了俄罗斯电视台导播间，俄方《等着我》栏目总制片人谢尔盖·古什涅廖夫对朱育理说：“我想要告诉您的是，您想要找的战斗英雄库里申科，那位战机坠落在扬子江、长眠于万县烈士陵园的飞行员，他就是我的外公，而依娜·库里申科是我的母亲。”

谢尔盖说，正是在50多年前，朱育理告诉她母亲外公牺牲在万县，那里还有他的纪念碑，他们家才找到了库里申科的下落，

还去万县祭扫。之前，家人一直认为库里申科是“失踪”了。

画面切换到万县库里申科墓碑，主持人采访了守护人谭忠慧老人和她的小儿子魏映祥。谭忠慧一家两代人信守承诺，为库里申科守墓半个世纪。电视镜头里，烈士墓前摆着鲜花，有人前来祭奠。

画面再切回莫斯科，谢尔盖眼里闪着泪花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记得那段历史。”

一个节目，画面切换两国三地，讲述了一段跨越 56 年又跨越 71 年“故事里套着故事”的故事。尽管有编导的刻意架构设计，但这期节目让中国老百姓再度忆起曾经熟悉的英雄群像。

1949 年 10 月 4 日，《人民日报》刊登库里申科当年的翻译刘群撰写的纪念长文《库里申科大队长——追记抗日战争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自此“库里申科”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54 年，年轻的朱育理到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留学，班长是依娜·库里申科。朱育理对依娜说，在中国有位援华抗战的苏联英雄，也姓库里申科，你



库里申科

和他一个姓啊。没想到，他所说的英雄库里申科，就是依娜寻找多年而不得的父亲。

1958 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邀请依娜和她的妈妈来华出席庆祝活动，并祭扫库里申科烈士墓。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握住依娜母女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

2013 年，我们在俄罗斯寻访期间，采访过谢尔盖·古什涅廖夫。他对我们的报道表达了感谢，认为此时寻访还原当年祖辈援华抗战的事迹很重要。这之后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2017 年，为库里申科守墓半个世纪的谭忠慧老人去世。2020 年，那个留学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后任中国航空工业公司总经理的朱育理也去世。

2015 年，一家两代人为库里申科守墓的故事搬上银幕，由宋春丽等出演的《相伴库里申科》，再现了谭忠慧一家的事迹。影片一开始，12 岁万州小女孩谭小慧在江边看到母亲被日机炸死，库里申科驾驶战斗机与日机格斗而壮烈牺牲。

其实，库里申科不是电影叙说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在重庆防空战中牺牲的。担负护卫重庆上空职责的是与库里申科同期来华的两名优秀苏联试飞员——苏普伦和科基那基。

查阅武汉报纸，1985 年有一篇题为《一腔热血卫楚天——抗战初期的武汉空战》副刊文章说：1938 年 2 月，日军将空袭武汉，“苏共优秀党员、苏联志愿援华空军轰炸大队长库里申科”就在武汉参与对日空战的决策了。

其实，1938 年 2 月，在武汉的轰炸机大队长是波雷宁。库里申科来华时间在 1939 年 6 月，而且驻扎在成都，面对来自日据汉口机场日机对大后方的轰炸。

沉重打击汉口“W 基地”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2 月 2 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达第 241 号“大陆令”，日本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与陆军航空兵团会合到汉口机场，要用空袭来摧毁陪都重庆。

1939 年 5 月 3 日中午 12 时 50 分，重庆响起防空警报，20 多分钟后，从武汉出发的 45 架日机沿江而上，分两批侵入重庆上空，投置 126 枚炸弹和燃烧弹。一时间，陪都上空浓烟蔽日，到处是爆炸和燃烧，瓦砾残垣中满是伤亡者。这一天，约有 2000 人在轰炸中死亡、3000 人受伤。

2016 年“九一八”纪念日前夕，武汉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墓总设计师黄康宇的遗孀蔡德庄以耄耋之年赴京，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连线俄罗斯，继续寻找墓碑上烈士的亲人。节目录制时，我和老人的女儿黄宝玲陪同。当老人回忆起她经历的重庆几次大轰炸的惨烈场景时放声哭泣，主持人倪萍和几位嘉宾也忍不住落泪。

从重庆大轰炸时起，汉口机场在中国人心中有了个军国主义色彩的名字——W 基地。要根除空袭的祸根，必须捣毁这个 W 基地。

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的解密档案显示：1939 年 6 月，两支 ДБ-3 大型远程轰炸机大队共 24 架战机，从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出发，经奥伦堡、阿拉木图秘密抵达成都。两支大队分别由库里申科和另一位大队长科兹洛夫带领。

抵达成都后，库里申科一边备战，一边教学。当他看到日机日夜来袭，老百姓四处隐蔽不得安宁时，说：“要让敌人付

出多倍的代价，要让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皇逃命。”

在成都经过秘密训练和准备后，1939 年 10 月 3 日晚，库里申科大队实施援华的首次轰炸行动，日据汉口机场 W 基地被炸得措手不及。

关于这次战况，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国的空军》第 27 期重点报道，标题繁复但形象生动——《伸入武汉的铁拳：上面是中国钢铁的拳头 / 下面是祖国坚厚的土地 / 中间粉碎的是日本飞机、油弹库 / 还有那日本狗熊》。报道说：“当此之时，一支可怖的箭头从我们这里突然伸出，跨山穿云，直插武汉。这支箭头是什么，是‘正义之剑’的光，是十月三日的武汉出击！”

据《中国的空军》报道，日本方面损失惨重，有 100 多架飞机伤毁，而伤亡的飞行员及机械人员达 200 多人，油弹库及飞机零件损失无法计算，后由上海运来数千箱以填补损失。从这天起很长时间，日军对武汉实施了夜间灯火管制。

2019 年，我在寻访中查找到一个名叫坂井三郎的日军飞行员撰写的回忆录，他很详细地记录了日军被轰炸的情形：当晚，W 基地的日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按部就班地做着程序性工作，突然从控制塔上传来一阵喊叫声，还没有等反应过来，强烈的爆炸声已在四面响起，轰轰巨响震耳欲聋，整个大地都在剧烈摇晃。地上是滚滚烟尘，空中是弹片横飞，飞沙走石。所有人都发疯似地往防空洞跑。过了一段时间，巨大的爆炸声减弱，有的地方砰砰作响，循着痛苦叫喊声与呻吟声望去，四处都是躺在地上身负重伤的日军。原来在长长跑道上一架挨一架整齐停放的 200 架“舰攻”和“陆攻”大多都燃烧着，炸开的油箱中滚滚浓烟卷着火舌翻飘出

来，有的油箱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噼里啪啦，呼呼啦啦，火势沿着机队和流淌的汽油拉开，像点着一盒盒的火柴。

坂井三郎从掩体下爬了出来，他侥幸只炸伤了腿。当他抬头望向天上时，12架轰炸机编队划过头顶，正在高空大转弯盘旋返航，这才意识到，机场遭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

10天后的10月14日，库里申科带领20架ДБ-3和СВ再度飞到汉口，分三波在8000米高空对W基地进行轰炸。据坂井三郎的回忆录记载，在10月3日轰炸后，日军每天都派战机在汉口和武昌上空近百次侦察和巡航，但依然没能防住库里申科大队的第二次远程轰炸，40架战机遭受损失，其中5架海军战机彻底烧毁，海军联队司令官也炸成重伤。

这次行动中，在高空巡逻的日方战机与志愿队编队进行了空战。据日方后来的战报，有两架中方战机在战斗中被击落，“其中一架中乘有苏联人”。

志愿队射击士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费多谢耶夫在飞机被击中后跳伞，后遭敌机扫射牺牲，遗体坠于距安陆60公里处的西杨镇附近。2016年10月，他的名字和其他13位烈士名字一起，增刻到解放公园烈士墓碑上。

据日方资料显示，遭到库里申科大队两次突袭后，W基地元气大伤，只得派机进行更大范围的巡航警戒，持续到1939年12月上旬才解除。

以命搏回 ДБ-3 战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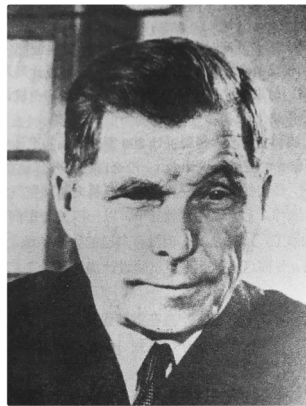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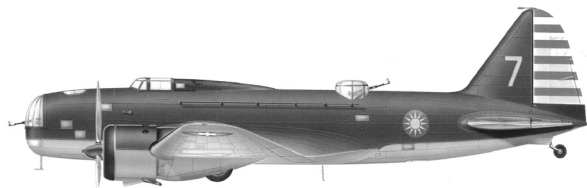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驾驶的ДБ-3在返航途中与追击而来的日机交战，机组击落了6架日机，但他的轰炸机左发动机被打中，靠单发动机突出重围。

飞到万县长江上空时，机身开始失去平衡，库里申科为了保证ДБ-3不再受损，硬是将其平稳降落到长江水面。机身沉入江底前，领航员和射击士脱下飞行服跳水游到岸边，但库里申科精疲力竭再无气力游上岸，不幸被滚滚江水卷走。

20天后，人们在万县下游发现了库里申科的遗体。一个月后，这架ДБ-3被打捞上来。1940年元旦，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追悼大会，将他安葬于长江边的太白岩上。

库里申科为何以命搏回ДБ-3，它到底是怎样厉害的轰炸机？

ДБ-3是当时苏联主要的大型远程轰炸机，由С·В·伊尔尤申设计。ДБ-3有两个双冷式发动机，载弹量和防御力量很强，自带三到四挺机枪和1000公斤炸弹，每小时能飞行320公里，航程达4000公里，飞行高度达9000米，由此才能避开日军的



ДБ-3 远程轰炸机和设计师伊尔尤申

常规空中巡航。ДБ-3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主力远程轰炸机，1941年8月最先对柏林进行空袭的就是ДБ-3的改进版伊尔-4远程轰炸机。

1939年10月后，库里申科等两支轰炸大队，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苏联援华的最重要空军力量，ДБ-3对重庆800公里外的W基地构成打击威慑。

正是由于ДБ-3具有优势性能，其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在当时的苏联空军中也是刚开始配备，数量有限。1939年6月，由12架ДБ-3组成的飞行大队，沿着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航线向中国抗战前线进发，每架4到6人，还有急救设备及储备物资等，飞机载重量很重，且中间站之间的飞行距离也达到极限。为了保证每架ДБ-3不出事故，一路上的机场着陆，都由库里申科亲自指挥。

关于库里申科对ДБ-3的爱惜，翻译刘群的《库里申科大队长》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当时有一些中国飞行员只顾飞行，不爱惜飞机，库里申科总在课上对他们说，飞机是国家的财产，战时中国从苏联购置战机不容易，都是经过很远的线路才运来的，希望学员们珍惜。”

我在俄罗斯联邦国立军事档案馆解密档案中，找到了当时苏联“Z计划”对库里申科的考察报告：“1907年生，联共（布）党员，工人，生于乌克兰；受教育程度，公共教育初级，军事教育——航空学校；1929年参加红军；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优秀飞行员，他在飞行工作中没有出现任何事故，有领导能力。”

一位优秀飞行员，可以命换回自己的战机——这也是库里申科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库里申科身后的大队长们

在库里申科身后，还有一群志愿队大队长，他们是不同战斗阶段的关键人物。我在寻访期间，对几位大队长和主要领队的援华事迹及后来情况做了一些整理，以丰富相关史料。

雷恰戈夫

1937年底来华，志愿队援华初期的首任总司令、总顾问。来华前，他就以光荣完成“X计划”成为“苏联英雄”。1937年底至1938年5月间，志愿队在华行动都由他指挥，波雷宁和布拉戈维申斯基是左膀右臂。1940年后，他任苏联分管空军的副国防人民委员。



雷恰戈夫（前排左2）

库尔丘莫夫

1937年10月1日，在毗邻中苏西北边境的阿拉木图，数百名执行“Z计划”的志愿队队员集结待发。经阿拉木图志愿队负责人彭普尔旅长批准，库尔丘莫夫成为首批И-16战斗机大队长，率队飞往兰州。在酒泉机场降落时，库尔丘莫夫的战机出了事故，发生“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库尔丘莫夫是第一位牺牲的志愿队员。他的队

伍由于没了领头雁，很长时间没有形成战斗力，后来归并到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战斗机大队，1937年底驻扎南昌机场，参与了多场武汉空战。



库尔丘莫夫



赫留金

波雷宁

本系列前两文已有较多讲述，这里着重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关苏联空军志愿队事迹的整个档案，很多都是他晚年受命收集梳理的。1968年5月，62岁的苏联空军上将、空军后勤部部长波雷宁，突然接到高层领导人命令：主持出版一本书，将自己当年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历也收录其中，计划1969年出版。在波雷宁的主持下，很多老战士开始撰写回忆录，大多收录入198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在中国的天空（1937—1940）》一书。1981年，波雷宁去世，享年75岁。

赫留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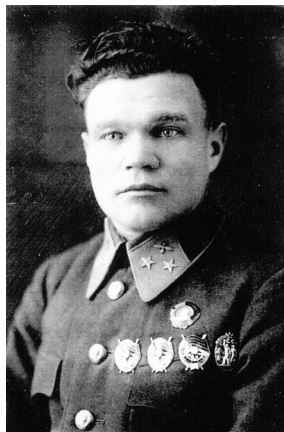
在本系列前两文也有详述，这里延续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事迹。1942年11月23日，苏军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对德军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战略大合围。希特勒得知保卢斯有要被吃掉的危险，当即派那个打下克里米亚的

曼施坦因去营救，命令他一定要把保卢斯从包围圈里“捞出来”。

在这个区域的作战飞机，德军有1200多架，苏军有1400多架，谁都没有夺取制空权的绝对把握。苏军将合围地区分成四个空域，其中一号空域为包围圈外围，所有德军机场都在这一区域。在这一区域的苏联空军第8集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从德军机场起飞的飞机。而司令员就是32岁的赫留金少将。他承受着巨大压力，顶在最前沿空域，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3年到1944年，赫留金连晋两级，获得空军中将和上将军衔。

1944年7月，赫留金调任第1集团军司令员，在解放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战斗中英勇果敢，1945年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53年，身为苏联空军副总司令的赫留金，遭遇车祸去世。

1938年6月开始的武汉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1942年8月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这两次保卫战有一个共同特点，空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能参加这两次保卫战的飞行员，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志性人物，赫留金当之无愧。



索尔



斯留沙列夫

索尔

参加过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的空战，能驾驶苏联的各种战机，是富有战斗经验的杰出飞行员。从1937年底开始，索尔就负责北线（从贝加尔经乌兰巴托到兰州）的援华运输工作，在兰州和伊尔库茨克之间进行验收、试飞和转运C B轰炸机。1938年7月，索尔抵达汉口机场，先后担任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志愿队总顾问等职，带领一支66名志愿队员组成的C B轰炸机大队参加对日抗战。1939年回国，被授予两枚奖章。1940年任空军少将，去基辅特别军区当了第62轰炸机师的副师长。

1941年9月20日，德军占领基辅，布琼尼、铁木辛哥元帅和政委赫鲁晓夫等突围。索尔坚持40多天的战斗，对德军的坦克、炮兵和机场进行轰炸达2000多架次。索尔驾驶轰炸机轰炸德军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飞机被击落掉进敌人阵地。索尔身负重伤失去知觉，被俘送往柏林盖世太保的莫阿比特监狱。

在哈默堡军官战俘营里，索尔不顾生命危险撰写、散发题为《被俘的红军指挥员应该怎么办》的传单。他还临摹了从德国工厂里弄来的战俘营地形图，搜集了工具，准备组织大家越狱。最后被德国人发现，将他押到纽伦堡监狱，关在一间孤零零的石囚室，1943年1月遭到枪决杀害，年仅39岁。15年后，苏联方面才从纳粹档案里得知他在集中营里斗争的事迹。

斯柳萨列夫

1938年7月接替赫留金任轰炸机大队长。卫国战争中，斯柳萨列夫历任西南方面军空军司令、第25集团军航空兵指挥员等，参加克里米亚、柏林、布拉格等地战役，后任外贝加尔军区空军集团军司令，中将军

衔。1950年2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先后任驻上海苏军防空集团军副司令、司令，反击败退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曾一度猖獗的空袭基本消除。

2017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斯柳萨列夫的女儿，她向我展示了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给她父亲的奖状：

斯柳萨列夫中将：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感谢你及由你所率领的防空专家们，在我国上海地区半年以来帮助我军在建立防空部队、训练防空人员、组织防空机构等工作中，获得的卓越成绩，以及在对敌空战中所获得的光辉战绩，特给予奖状。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那些在中国经受战斗洗礼回国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大多都去了西线对德作战的最前沿。赫留金、波雷宁、索尔、斯留沙列夫、尼古拉延科等曾在长江上空对日空战的志愿队大队长，在卫国战争中已具备丰富的空战经验，成为当时苏联空军的重要将领，战绩留在了二战的史册上。

谌达军，长江日报高校新闻中心主任、
主任记者

《金口镇志》引录《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指谬

◇ 胡晋鄂

有清一代，金口一位热爱乡梓的贡生名段灿，他由贡生任衡山训导。训导为有编制的基层地方官员之一，位阶从八品，通常辅佐地方知府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段灿，字以融，号陶谷。读书论古有卓识，喜游览，耽吟咏。谓金口即古涂口地，而《志》反不载。因此，他引陶渊明《夜行涂中》诗为据以辨之。段灿引经据典、爬梳剔抉、条分缕析，用敦厚的史实、浓稠的情感和精彩的文字，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这篇不长的“记”，成为研究金口的“指南针”，也是研究金口

者或本邑乡贤的“必读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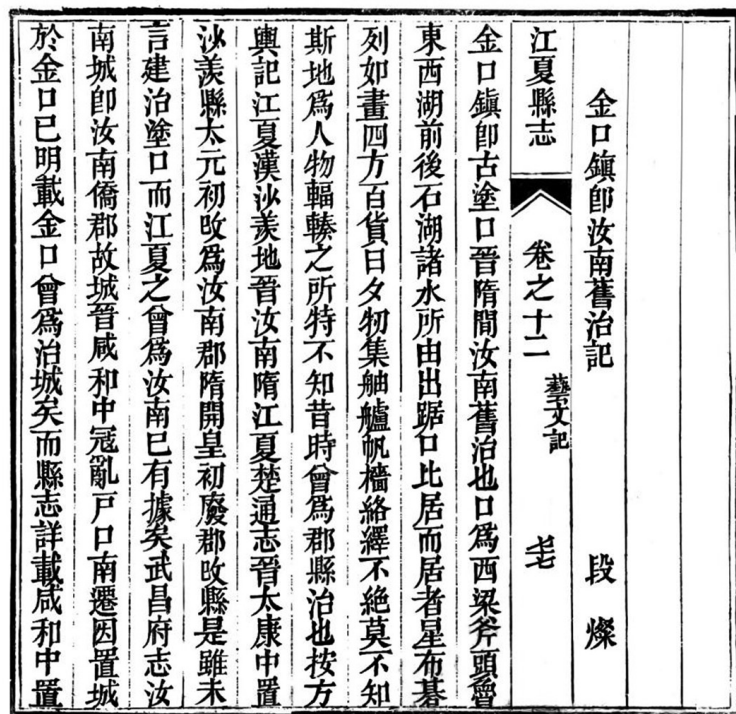
但令人遗憾的是，具有一定权威的《金口镇志》（任永山主编，1991年版）在刊录这篇文章时有误植、脱漏和窜改行为，更令人不堪的是后来的引用者都无一例外的以此为蓝本照录，以致谬误流传，使这篇文章的文学品位和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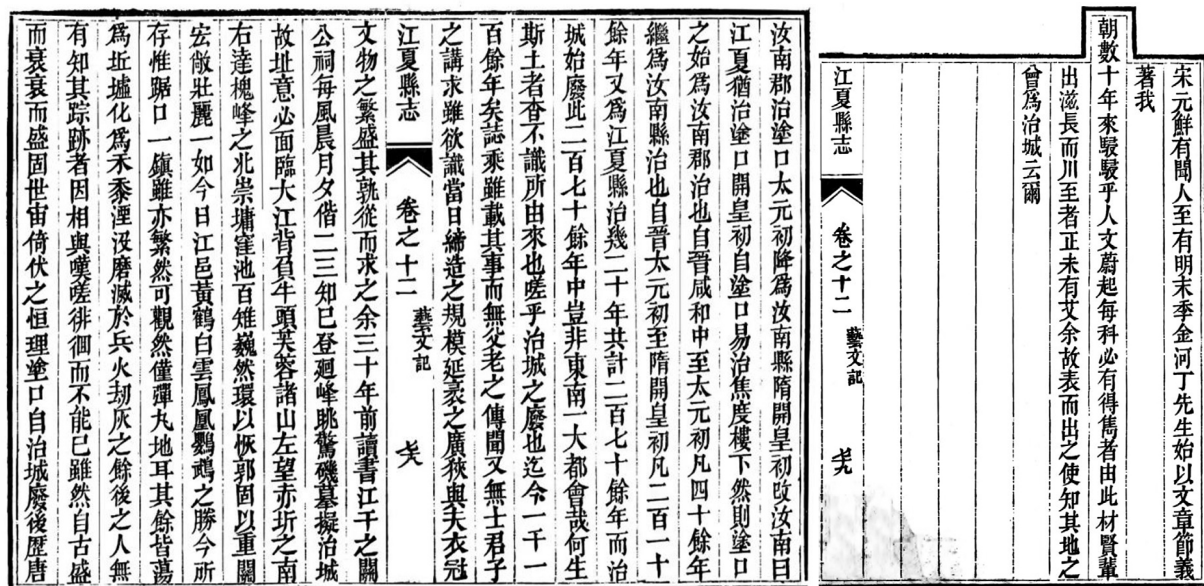
笔者在翻阅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夏县志》时，读到先贤段灿的这篇文章，发现《金口镇志》所刊段文误差甚多。现将《江夏县志》的原文刊录如下，《金口镇志》中录该文与之不合者用方括号标出。

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

金口镇即古涂口，晋隋间汝南旧治也。口为西梁、斧头、鲁湖〔湖为衍文〕东西湖、前后石湖诸水所由出。踞口比居〔居讹为屋〕而居者星布，碁列如画；四方百货，日夕物〔物讹为物〕集；舳舻帆樯，络绎不绝。莫不知斯地为人物辐辏之所，特〔特讹为殊〕不知昔时曾为郡县治也。按《方輿记》：江夏〔《方輿记·江夏》江夏讹升为标题〕汉沙羡地、晋汝南、隋江夏。楚《通志》：晋太康中置沙羡县，太元初改为汝南郡，隋开皇初废郡改县。是虽未言建治涂口，而江夏之曾为汝南已有据矣。《武昌府志》：汝南城即汝南侨郡故城。晋咸和中寇乱，户口南迁，因置城于金口，已明载金口曾为治城矣。而《县志》详载：咸和中置汝南郡，治涂口。太元初降为汝南县，隋开皇初改汝南曰江夏，犹治涂口。开皇初自涂口易治焦度楼下，然则涂口之始为汝南郡治也。自晋咸和中至太元初凡四十余年，继为汝南县治也；自晋太元初〔至太元初凡四十余年，继为汝南县治也；自晋太元初——此句脱文〕至隋开皇初凡二百一〔一讹为五〕十余年，又为江夏县治几〔几讹为凡〕二十年，共计二百七十余年，而治城始废。此二百七十余〔余，脱文〕年中，岂非东南一大都会哉。何生斯土者，杳不识所由来也。嗟乎〔乎植为呼〕！治城之废也，迄今一千一百余年矣。志乘虽载其事，而

无父老之传闻，又无士君子之讲求，虽欲识当日缔造之规模，延袤之广狭，与夫衣冠文物之繁盛，其孰从而求之？余三十年前读书江干之关公祠，每风晨月夕，偕二三知己，登迴峰，眺惊矶，摹拟治城故址，意必面临大〔大讹为长〕江，背负牛头、芙蓉诸山，左望赤圻之南，右达槐峰之北，崇墉窪〔窪植为洼〕池，百雉巍然，环以恢郭，固以重关，宏敞壮丽，一如今日江邑黄鹤白云、凤凰鹦鹉之胜。而今所存惟〔惟植为唯〕踞口一镇，虽亦繁然可观，然仅弹丸地耳。其〔其，脱文〕余皆荡为丘墟，化为禾〔禾讹为离〕黍，湮没磨灭于兵火。劫灰之余，后之人无有知其踪迹者，因相与叹嗟〔叹嗟讹为嗟叹〕徘徊而不能已——虽然自古盛而衰，衰而盛，固世宙倚伏之恒理。涂口自治城废后，历唐、宋、元，鲜有闻人，至有明末季〔季脱文〕金河丁先生，始以文文章节义著〔著讹为者〕。





清乾隆版《江夏县志》（十二卷艺文记）《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

我朝数十年来駸駸乎人文蔚起，每科必有得雋者，由此材贤辈出，滋长而川至者，正未有艾。余故表而出之，使知其地之曾为治〔治讹为郡〕城云〔云脱文〕尔。

《金口镇志》编于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时期，当年查阅历史资料很困难，引文中出现一些小瑕疵似乎在所难免，也还情有可原。但对历史文献加以窜改就咎难容恕了，如文中有“自晋咸和中自晋太元初凡四十余年，继为汝南县治也；自晋太元初至隋开皇初凡二百一十余年，又为江夏县治凡二十年，共计二百七十余年，而治城始废”。由于该引文中脱漏“至太元初凡四十余年，继为汝南县治也；自晋太元初”若干字，其句式变为“自晋咸和中□□□□□□至隋开皇初凡二百一十余年”。大概刊录者也觉得时间对不上榫——“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差四十年矣！于是自作聪明对古籍作了“调整”，将“……自晋太元初至隋开皇初凡二百一十余年”窜改为“凡二百五十余年”。

算是大致平衡了，但原作者强调的历史真相被湮没了。

2021年，江夏区民政局组织编纂出版的《荆楚古镇：金口》一书中，对该文作了正确的引述（由笔者执笔）。但限于体例，未能指出《金口镇志》中引述《金口镇即汝南旧治记》的错误。余为礼敬前贤，还其美文，故不揣鄙陋，尝补偏救弊，特“表而出之”。

胡晋鄂，原武汉电子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